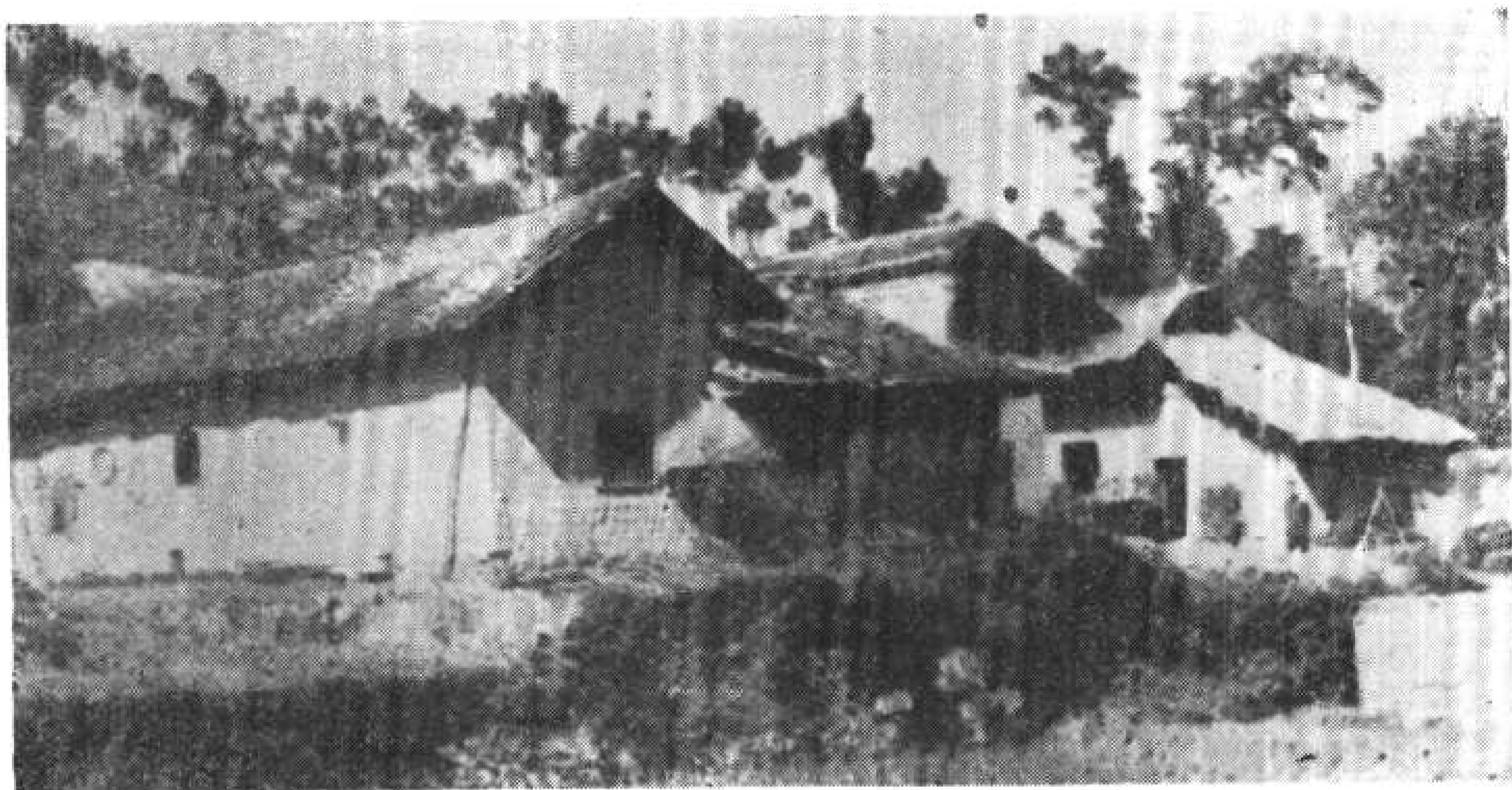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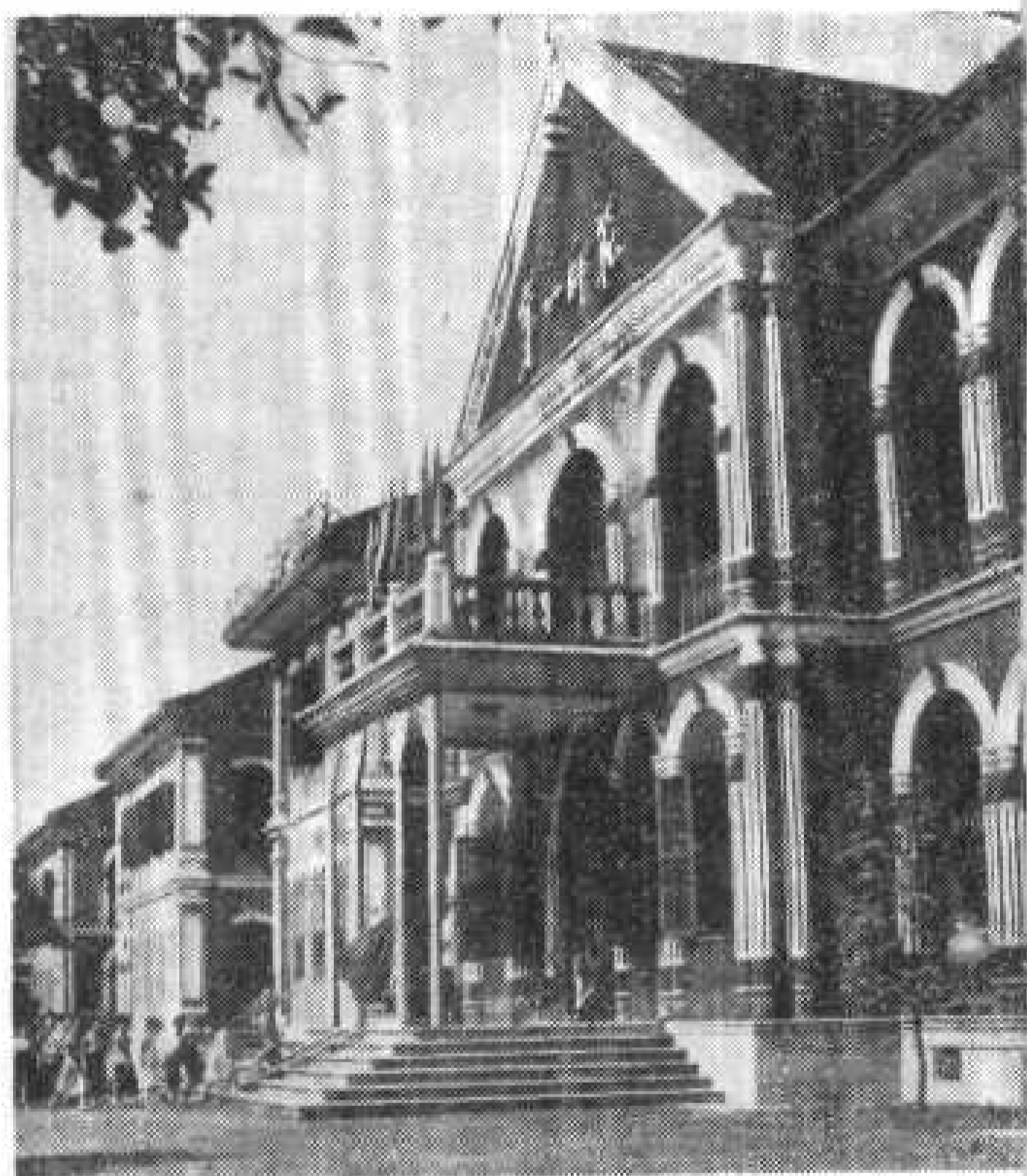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在上海。

(一九二四年)



一八九三年毛泽东
同志诞生在这所普通农
民的屋子里。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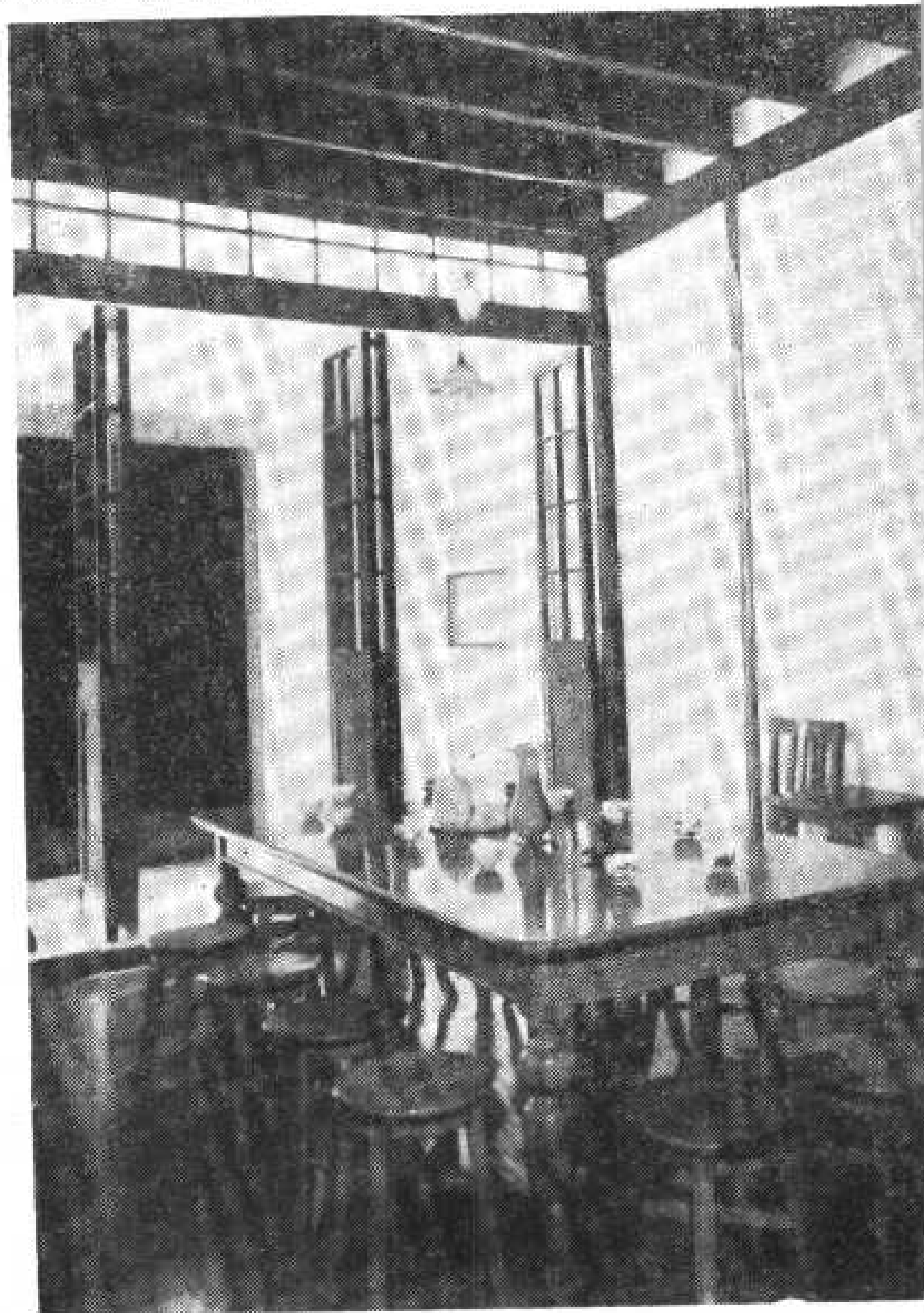
长沙岳麓山爱晚亭。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求学时，暑期内和
蔡和森、张昆弟同志住在
此附近读书谈学问，锻炼
身体。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八年秋至一九一九年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工作室。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长沙清水塘，
毛泽东同志亲自创
立的中国共产党湘
区委员会旧址。

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一年秋在
安源的旧居八方
井四十四号。



目 次

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前进(序言).....(1)

第一章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

的少年.....(5)

一 农民的儿子.....(5)

二 六岁就开始参加劳动.....(7)

三 一个诚实的孩子.....(10)

四 从小就好学.....(13)

五 但他是倔强的.....(15)

六 被压迫人们的少年同情者.....(17)

七 年十五六而志于救国.....(21)

第二章 卷入辛亥革命运动的漩涡.....(27)

八 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27)

九 干革命——当兵去!.....(31)

一〇 注意时事和社会问题.....(33)

第三章 他是怎样认真学习和刻苦锻炼的.....(37)

一一 要求学还是靠自修.....(37)

一二 博与专的学习.....(39)

一三 学问,学问,好学还要好问.....(41)

- 一四 读书的“四多”方法……………(43)
- 一五 “特别”学生……………(44)
- 一六 锻炼身体，锻炼意志……………(45)
- 一七 “游学”——开始作社会调查……………(48)
- 一八 政治的头脑，科学的头脑……………(51)

第四章 “组织起来”的第一页

(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54)

- 一九 组织家的天才……………(54)
- 二〇 学生自治团体——学友会组织起来了……………(56)
- 二一 和城市工人最初的接触……………(58)
- 二二 最初的反军阀斗争和第一次受军事洗礼……………(60)
- 二三 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64)

第五章 站在新文化运动——

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哨……………(71)

- 二四 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71)
- 二五 接触马克思主义……………(73)
- 二六 开展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74)
- 二七 革命的新闻、政论工作——
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77)
- 二八 领导“驱张运动”……………(82)

第六章 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85)

- 二九 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为坚决的
马克思主义者……………(85)
- 三〇 宣传！组织！斗争！……………(88)
- 三一 他同时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91)

三二	找到了更好和工人接近的语言.....	(95)
三三	“作始也简”(成立中国共产党).....	(97)
三四	可纪念的“三十节”.....	(100)
三五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101)
三六	创办最初的“党校”.....	(104)
第七章	大规模地努力作工人运动	(108)
三七	斗争是不简单、不容易的.....	(108)
三八	工人阶级抬起头来了.....	(111)
三九	“我就是工人代表”.....	(114)
四〇	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支雄厚力量—— 安源工人俱乐部.....	(121)
四一	湖南工人运动的扩大和深入.....	(130)
四二	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	(136)
四三	组织全省工人的总司令部， 向统治阶级作大无畏的正面斗争.....	(138)
四四	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145)

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前进(序言)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长辞我们去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每个革命人民的心中。他的杰出著作，永远是马列主义发展的丰富宝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是我们前进的旗帜。我们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

为了帮助青年读者，也为了遵循任弼时同志一九四三年秋在延安对我的郑重嘱咐：“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极力赞助，免除我一些会议，专为写这本书，希望在十二月下旬完成。我具有写作此书的便利条件：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在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别十多年后的三十年代末期，复在延安相处六年余，过从颇密。以后在阜平，在平山西柏坡……我备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所以四三年虽然他坚决不肯作寿，我仍然陆续地片断地写作下去。此外，我在延安遍找了许多革命老同志(包括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董老、林老、徐老、谢老、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老同志)，或作长谈，或作短

叙；或连谈多次，或仅片言只语，请他们谈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我记录了下来。因此在延安、张家口发表过几篇关于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文章^①。后来，我继续写了井冈山、古田、遵义会议，直至颇为完整的“七大”一章。已经发表了的几篇拙作，一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一方面使得一贯谦虚自持的毛泽东同志几次传话，叫我停止写他个人，最后亲自劝我多写群众……当我说：“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党的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义……”他便不作声了。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枣园春节联欢午餐之前，朱德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而毛泽东同志极为赞成的时候，我在旁插言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泽东同志听了，当即转过身子，盯着我说道：“那你还是有心人喏！”停一会儿又说：“那你就搞下去吧！”

这一最后指示给我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决心。在延安，在张家口，在阜平，在平山东、西柏坡，甚至在冀中前线，我始终没有停止收集资料的工作。到一九四七年底，大体完成了截至“七大”为止的大部分初稿^②。一九四八年我搜集各地民歌成一集子：《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初写了《毛泽东同志论“五四”》，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一个小册子。后两种稿子都因辗转迁移遗失了。一九四九年春写好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经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审查批准，是年八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很快有日、德、英、印地、捷、匈等文译本，法文也有摘译，日译本名《青年毛泽东》，译者岛田政雄和玉嶋信义，德译为捷克驻华第一任大使魏斯科普夫的夫人，译法比较自由。

全国解放前后，党派我作国际活动。事务性强，无法写作。但趁短期回国之际，一九五二年冬我遄返湖南长沙、韶山、湘乡一行，遍访乡间父老与个别旧友。我瞻仰了毛主席的旧居和他青少年时期在家生活和劳动的场所，同毛泽民烈士的前夫人王淑兰大嫂絮谈泽东同志青少年在家乡的故事。一九五四年我编写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但因故未普遍发行。

使我引为终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近十多年我被迫中断了写作，以致没有完成编纂“毛传”的任务。每一念及，至为痛惜！

现在，衷心感谢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权威顾问，使得虚度了八十多岁的我，得以重新握笔，再次修改这本书。在写作时，我力求实在、通俗、通顺。（很抱歉！没有完全作到。）让我用这点滴文墨，连同一颗赤诚的心，永远纪念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并且和读者共同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至希读者指正。

对前前后后供给我关于毛泽东同志生平事迹材料的许多同志，已故的我永远纪念他们；健在的我深深地致谢！

在修改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同志大力帮助我整理全书，我在此特别对他表示谢忱！

萧 三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

注 释

- ①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二两天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我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当时副刊编者艾思奇、周立波同志在出报前立即分别来信，鼓励有加。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中共二十五周年，张家口《晋察冀日报》发表我写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红字印刷，占一整版。一九四二年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同志要我报告毛主席的生平事迹，我讲了两个下午。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晋察冀边区党委召集大会庆祝毛主席五十三岁大寿，我做了一个关于毛主席生平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一月对张家口一千二百个青年师生作了“向一个好学的人——毛泽东主席学习”的报告。一九四六年张家口出版的月刊《北方文化》第一号发表了我写的《毛泽东同志传略》，此文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许之桢同志编的《毛泽东印象记》作为第一篇转载。一九四六——四七年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我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这些文章曾由当时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或汇集成小册，广泛流传。
- ② 一九四七年底，我写完了《秋收暴动——向井冈山进军》、《开展了十年土地革命》、《遂川之行》、《纲领性的古田会议决议》、《粉碎对中央根据地的四次围剿》、《精辟深邃的理论，正确灵活的政策》、《革命的灯塔举得更高更亮了》、《他的本色和某些作风》和比较全面的关于“七大”的一章——《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除后者专案组至今没有退还给我外，其它初稿，拟全部交给中央机关，供编写党史者作参考。

第一章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双重压迫下的少年

一 农民的儿子

在中国的中南地区，在浩浩荡荡的长江（扬子江）的南岸，有我国一个最大的湖泊——洞庭湖。湖的南面，伸展着一块美丽的大地；流着湘、资、沅、澧四条江河（它们都流入洞庭湖，又转汇入长江）；蜿蜒着五岭山脉、雪峰、武陵，以及衡山脉——这里有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的南岳山。在这块大地上，盖着密密的树木、竹子、茶山、果树……铺着整齐的稻田、棉、麻、菜园……住着三千多万人——现在增加到四千八百万了。

这就是湖南省，中国最美丽的和最富足的省份之一。

在湖南省湘江流域的湘潭县韶山冲，有一座大山，叫韶山。传说大舜南巡，曾在这里奏乐九成^①。虞舜的音乐叫“韶乐”，所以舜到过的山叫“韶山”。

山上有韶峰、凤仪亭、仙女庵、胭脂井、石屋、顿石、塔岭、石壁等八景。韶峰高达五六里，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②。这山好象一座锦屏，一起一伏，绵亘约二十里长。这个地带原就叫作韶

① 《书经》上说：“箫韶九成。”乐曲一终为一成，九成就是九章、九阙。

② 八景全名为，韶峰耸翠、凤仪亭址、仙女茅庵、胭脂古井、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石壁流泉，现在都年久失修了。韶峰又名仙女峰，有诗云：“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

山冲。一般说，冲长十里。

在这个南国风光、山清水秀的冲里，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房屋^①，住着毛、李、锺、周、邹、彭、庞……几姓人，内中姓毛的最多。他们大都是种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忠厚、朴实、勤劳、善良的老百姓。

韶山的落脉处是一座不高、草木茂盛的山，叫韶山嘴。韶山冲有一条小溪顺着韶山，经韶山嘴，弯弯曲曲，向东南缓缓地流过去。在韶山嘴的对面，在那山环水抱的南岸，有一栋半瓦半茅的朴素的房屋，叫上屋场。那时候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家人，堂屋正中为界。公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清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阴历十一月十九日），这所房子里的毛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的父亲名顺生，本是一个贫农——最初只有田五亩到七亩。青年时代因家里欠债很多，他曾经出外当兵。那时候的军队，给当兵的发饷银。他回到了家乡之后，就拿自己积下来的饷银作本钱，买回自己的几亩地，同时做些小买卖。

他肯劳动，会节省，是一个好当家。钱积够了，他还了债，买了田，自己耕种。家里省吃省用，大家劳动。他的一面把每年食用以外的剩余，押进田产，取利息钱；一面作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家里耕种田地的事就雇长工、短工和叫儿子劳动。这样，他的家产就渐渐发达起来了，最后共有田二十来亩。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这时的家庭情况说：“这样，我家就归到‘富农’一类了。”^②

① 湖南一带的乡村，不似它省村落之连楣接屋一大片。

② 斯诺：《西行漫记》

二 六岁就开始参加劳动

毛泽东同志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经受着深重的灾难。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重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加紧对外扩张侵略。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了。“万里长城”事实上已经完全被洋枪、大炮、米突尺和十字架（即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所冲倒了。自从一八四〇年（泽东同志诞生前五十二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又遭受了多次的外国侵略战争。最大的一八九四年（泽东同志诞生一年后）即甲午年的中日战争，和一九〇〇年（泽东同志诞生七年后）即庚子年的八国（美、英、日、法、意、俄、德、奥）联军入京。中国被迫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除巨额赔款之外，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和许多块领土。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我们这五千年来的东方文明古国，逐渐地变成了任凭人们宰割的半殖民地，并且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①。

清朝政府是很腐败的和没有能力的政府。它对外，过去是自骄自大，现在却变成了完全顺从帝国主义的羔羊。对内它仍然是专制、独裁，对中国人民加紧压迫、剥削，并且依靠洋人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这个封建皇朝政府因为负了大量的外债（每次和外国作战败了，向外国赔款，等等），又加上官僚机构的浪费，慈禧太后生活的极端奢侈，于是更加残酷地来压榨人民群众。苛捐杂税，非常的多。社会很不安宁。人民的痛苦一天天加重了，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受的剥削最厉害。

自从中国和外国通商以来，洋货打进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呢、绒、洋布代替了土布，洋油代替了植物油，洋火代替了火石，洋靛代替了土蓝，洋钉代替了土铁钉……这样一来，中国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副业就都受了打击和渐渐地破产了。本来，中国的豪绅地主和高利贷者兼并了许多土地。大多数的农民就都是少

-
- ① 外国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后，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进攻中国，一八八四年有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有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美、英、日、法、意、俄、德、奥八国联军入京。不平等条约：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中英虎门条约，一八四四年中美条约，中法条约，一八五八年中俄爱珲条约，中英法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中英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一八七八年及一八八一年中俄伊犁条约，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约，一八八六年中英协约，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减轻关税，让大批洋货进来，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海关监督权也属了外国人，保护传教，让外国在中国各地设领事馆，并享有治外法权，帝国主义的武装也可以随便深入中国内地，辛丑条约更划定各国公使馆境界，由各国自行武装防守管理，不许中国人居住，使馆变成外国领土，和各地的“租界”，形成了“国内有国”，北京东交民巷成了中国的太上政府，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外国得派兵驻守，大沽炮台完全平毁……除主权丧失外，外国侵略者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英国占领了香港，沙俄并吞满蒙新疆边境（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掠夺中国领土达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劫夺我国领土最多的侵略者），葡萄牙并吞澳门，日本并吞台湾、琉球、澎湖列岛。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长江中部属英，东北三省属沙俄（日俄战争后东北三省南部又转入日手），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各国得在其范围内修铁路，开矿山，驻军队。美国帝国主义来得迟些，就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为的是“利益均沾”，要列强开放在华租借地和所谓“势力范围”，同时要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大家都可分享侵略利益。

地或无地的贫穷户，他们向地主租地来种，要付重租重息，占他们辛苦所得的大半。还有一部分农民，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地主和富农当雇工。现在又加上帝国主义的剥削，人民生活的贫穷、痛苦就更加重了。

湖南湘潭在鸦片战争后将近二十年的光景，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市场。当时凡是外国运来的货物，到了广东上岸后，就先运到湘潭，由湘潭再运到中国各地。中国的丝、茶运去外国，也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非常繁盛。陆路肩货的工人不下十万人^①。

毛泽东同志的父亲处在这样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波及的贫瘠的乡村中，靠自己的克勤克俭，努力经营，建立了他的家务。毛家这时有五口人：父亲、母亲、泽东同志和两个弟弟——泽民、泽覃。这一家人的生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②，人人都参加劳动，有一种新兴的气象。

毛泽东同志从六岁开始就在田里帮助劳动。满七岁后他开始上学，但每早和下午放学回来的时候要放牛，做零碎事。到十三岁后，农忙的时候，他白天要在地里作一个成年人所作的工作；农闲时要在家里磨谷子、舂米，或放牛，或上山砍柴——就等于一个长工。晚上他还要帮父亲记账，因为他这时候是全家识字最多的人。他父亲常在夏天月亮底下教他和弟弟泽民打算盘，要他们学会同时用两只手打。

泽东同志是一个劳动的能手。他种地勤锄草，人家锄两遍，他锄三遍，并且看见草就扯，因此他的田禾比别人的都长得好。他又自己在山坡下面开辟一块菜地，种出各种各样的蔬菜。他

① 见容闳著：《西学东渐记》。

② 《朱子家训》开头的話。

把菜园收拾得就象一个花园。他并且自己喂牛，喂猪。他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篦，使得牛毛里不长虱子^①。牛栏和猪楼都打扫得很清洁，所以他喂的牛和猪从来不害病。

在劳动和农闲娱乐的时候，十几岁的毛泽东同志常常带头组织。

在放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把附近人家看牛的孩子组织起来，一面看牛，一面做各种有趣的游戏。泽东同志把孩子们分成两班：一班负责放牛，另一班到山上去采野果子。每天轮流换班地作。等野果子采到了，他就按人数分成几份，每人发一份。有时把没有分完的野果子，用草绳拴起，撩得高高的，叫大家来抓。抓得好、跳得最高的，他还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出来，奖给他。这样，大家牛也放得好，玩得也很高兴。

乡村每年过春节和秋季，农民们玩龙灯。毛泽东同志很会玩龙灯前面的珠。玩珠的就等于戏剧的导演或乐队的指挥，是玩龙灯者们的“司令”。

从小就耕种田地，从小就受了劳动的锻炼，并且热爱劳动，毛泽东同志所以深刻地知道中国农民群众的生活，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也知道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力量。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农家子出身。——这个出身，这个环境，使得他从小时以来就和农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且热爱劳动人民。

三 一个诚实的孩子

毛泽东同志的母亲姓文，湘乡人，是一个德性很好的女人。

^① 到现在他出生的家里还保存有那个牛篦子。

她待人和善，特别照顾劳动者，怜惜穷苦人，肯给人帮助。每逢荒年旱月，她背着丈夫，把米施舍给饥饿的人们。她的贤良在乡下是有名的。同时，她的治家节俭也是有名的。她除抚养儿辈外，要作一般农妇所作的事情——做饭、拾柴、扯草、纺纱、缝补和浆洗……

母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她作任何事总是踏踏实实地一直作到底。别人看去，似乎她的作法很笨，但是她不作成就决不肯放手。

毛泽东同志非常之爱母亲，孝母亲。他对母亲是一贯温顺，体贴周到的。母亲的一切美德，对泽东同志的影响很大^①。

乡间传说着几个关于毛泽东同志小时的故事：

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了下来，都摊在坪里晒着。忽然，天下起雨来了。大家忙着收谷子。幼年的毛泽东同志且不收自己家里的谷子，而先帮助一家作佃户的去收，结果自己家里快要晒干的谷子又被淋湿。父亲生气了。泽东同志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些……

一个冬天，泽东同志离家去学校读书。路上遇着一个穷苦的青年，他在风雪的冷天里还只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泽东同志和他谈了几句话之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给了他。等到假期回家，家里检查他的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质问泽东同志，泽东同志照实地说了出来。

^① 一九一九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的母亲去世时，他写了一篇《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迹亲疏，一皆复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谎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挽手，酸心结肠；但书汝辈，各务为良。”

又有一次，也是冬天，他从学校回家，和他的叔叔一道，在半路上一家客店里歇宿。客房里又来了一个客人住宿，第二天还没有天亮他就走了。泽东同志起来时，找不到自己的棉裤。他的叔叔马上去追那个客人，果然是他偷走了，就把他捉回来，骂他。但泽东同志和那客人一谈，知道他是个失业的工人，大雪天只穿一身单衣服，也没有一文钱。泽东同志就把自己的棉裤送给他了，并且留他在店里吃了早饭，还送他一串铜元作路费。

旧时我国的习惯，一到年底，大家算账、清账，非常紧张。一个旧历的年底，父亲叫泽东同志去人家取回一笔卖猪的钱。在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一些衣服褴褛的穷苦的人们，就把手里的现钱都给了他们。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居，老妇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赶猪回家。过了六七天，猪价也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那老妇人正在抽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因为把猪卖早了。她又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穷苦人少两块钱就是一个大缺空呵。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又放了定钱，你就赶去好了”。泽东同志听了这些话，想了一番，就对她说：“是呀！你又喂了六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只拿了邻人退还的那一元定钱，回到家里。

离韶山冲不远的花园冲彭氏祠堂办了一个小学，一个姓柳的小学生年纪最小，但很聪明好学，家贫难买纸笔。一天，泽东同志劝老师助他学习，并自己拿出一千二百文铜元给这个小學生，给补助学习费用。

泽东同志长大一些的时候，每次从长沙回乡，都到邻居农民家里去走走，照家乡的习惯，问“伯伯”、“叔叔”、“大哥”、“大嫂”

好，这样，即使曾经和他父亲吵过嘴的人，都心平气和，顿释前嫌。

韶山冲的老人们到现在还常谈起这些故事。“润之^①先生从小就是很讲礼性(讲理)的，”他们说。

还有一个很有意义、足以启发我们深思的故事：一天，泽东同志的父亲叫他和他弟弟去收田里的拖泥豆。弟弟调皮，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拾。豆稀，拾起来容易些，面积也宽些。泽东同志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密的地方，老老实实地一颗一颗地摘、拾。这样，时间要得多，但面积却比较小。父亲来了，随便一看，竟称赞弟弟而责备哥哥。但泽东同志拿篮子里所得豆子的数量给父亲看，父亲也就不说话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泽东同志从小做事就是踏踏实实的。他小时就具有一种忠厚、诚实和朴素的品质，这也感染了弟弟和其他人。

四 从小就好学

毛泽东同志八岁时开始念书，先在离家很近的南岸私塾，两年后转入桥头湾、井湾里等地私塾，到十三岁才离开私塾。他在学堂里一派正经，不随便说笑、吵闹。功课没有完，拉他不动，他总是一句一句地读，一笔一笔地写。当时私塾里所教的经书，对于儿童是很难懂和枯燥无味的。那时的教授法只是叫儿童死记，背诵。书里面说的是什么，先生并不讲解，讲也讲不清楚。小学生们大都莫名其妙，有的完全不懂，有的只是似乎可懂。毛泽

^① 润之是毛泽东同志的号。

东同志按照老师的规矩，读完他的功课。他很聪明，记忆力强，领会得也快。但他那时就是反对读死书的。他不喜欢那些经书，却挤出时间来，自己学习。

他非常喜欢旧中国流行的许多小说：《精忠传》啦，《说唐》啦，《西游记》啦，《封神榜》啦，后来就是《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等等，他都读了又读。他读完经书之后，和别的小学生一样，把小说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老师走过的时候，就用经书盖住。有时老师也知道他在读那些“杂书”，但却没有办法责备他，因为他的经书读得也很好，念上几遍就都记得，都背得出来。

那些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毛泽东同志都记得非常的熟，他时常对别人讲述，和大家谈论。放牛或农作完了的时候，他和小朋友们扮演书中的故事——武松打大虫（虎），演得很象。看的人都喊：“再做一回！”那些读物后来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他对小朋友讲小说故事的时候，成年、老年人也都来听，并且质疑，所以他们都尊敬他。

泽东同志求知识的欲望是很强的。他虽然白天要作工，晚上要记账，但他还是挤出时间来读书——在夜晚记账后，读所有他能找到的书。他父亲不高兴：一来，儿子读的不是经、史；再则，要节省灯油呵。泽东同志就用蓝布被子盖住窗户，使外面看不见灯光。在一间简陋屋子的楼上，在豆子大的桐油或菜油灯光下面，他把那时在乡下所能找到的一些书都读了。

传说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泽东同志去野外放牛。他让牛吃草，自己却在大树荫下的草地上用心地看书。他读的那样出神，忘记了一切。牛跑到邻人的菜园里去吃菜了，他也不知道。等邻人发觉后，他才放下书本，赶忙把牛从菜园子里赶出来。为了这件事，几乎闹了一场大乱子。

泽东同志几乎完全废学了一个时期之后，由于自己坚决地要求，曾被允许从他的一位堂兄读《左传》。那时他开始作文。后来又从一位堂叔^①读了《纲鉴》、《史记》、《日知录》等古书和一些新书，并且请他改文章，进步很大。

五 但他是倔强的

旧时代教私塾的先生最喜欢鞭打自己的小学生。那时候流行着一句这样的话：“棍子底下出好人。”旧日的父兄师长就根据这个“理论”来“教育”儿童。打板子，打手心，打头、脚、股，罚跪香——叫小学生跪在有棱角的“钱板子”（拦铜钱用的）上，或砂石上，一根香燃完了才许起身；有时叫小孩子跪下，手捧一把香，香的烟熏着鼻子很难受，但不许动。这些都是最普通的体罚。毛泽东同志反抗了这种“教育”制度。他作的是消极的抵抗——逃学，出走。他怕挨先生的打，逃出学校；又怕挨父亲的打，不敢回家。有一次他逃走出来，只往山下走，朝着一个想象的城市方向走去。谁知走了许久许久，还只是在一个山谷里兜圈子，离家不到十里路，终于被家里找回去了。但回家之后，出乎他意料之外，情形反而比以前好了一些：父亲不象从前那样暴戾了，塾师也温和多了。这一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予泽东同志小小的心灵以非常深的印象。他的“罢工”斗争胜利了——他自己后来对人笑着说，幽默地引用一些新的术语。

泽东同志的父亲治家谨严，对孩子们也很严厉。他因事生

^① 此人是毛家的一个秀才，名毛钟麓，出过远门，到过云南（蔡锷处），后来主张毛泽东同志去东山洋学堂，两次都是他说服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而后照办的。

气，打两个大一些的儿子。泽东同志站着不动，挨了打也不哭。但是后来的经验使他明白了：当他用公开反抗的方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他父亲就和善一点；当他怯懦屈服的时候，父亲反而打骂的更凶。他找到了用“斗争”来“自卫”的办法。

他十来岁的时候，举行过一次反抗封建家庭的斗争，使得父亲的暴力政策归于失败。一次，他父亲当着许多客人骂儿子“好吃懒做”。原因是他太喜欢读书了，而且读的是一些“杂书”。这对泽东同志是大的侮辱，同时，罪名也显然是不真实的，冤枉的。他越想越不服气，据实反驳了父亲几句，声言要离开家庭，而且往外就跑。母亲出来追他，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命令他回去，但同时还是骂他。他已经走到住屋前两个水塘中间的路上。看见父亲来势很凶，于是他说，如果父亲再追上来打他，他就跳到水里去……结果讲和了；这一面，他向父亲磕头请罪；那一面，父亲不再打他了。客人散了，他随着母亲回到家里。父亲进去了，躺在床上。母亲领他走进房里去，叫他对父亲跪下，但他只跪一只腿。母亲在旁边用手压他的肩膀，叫他双膝跪下去，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泽东同志更加懂得了：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有胜利！

他又曾引经据典和父亲斗争。那就是他父亲经常责备他“不孝”，他就据理力争，说：经书上讲的，“父慈子孝”，“父慈”在先，就是说，必“父慈”而后“子孝”。

父亲勤劳生产，以至起家。泽东同志自己也从小就参加劳动。但是他父亲作米生意赚钱，甚至在荒年也不肯平糶出去，这是儿子所极不赞成的。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这些观点的不同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也可见泽东同志自小便不作损人利己的事，甚至最小的，旧社会上一般认为是正当的。

泽东同志反对他父亲的专制，自然同情于在父权下受压迫的母亲。母亲不赞成父亲那种治家的办法，但不直接公开反抗，只是从容劝说，或消极抵抗。这种不平现象对于幼年的泽东同志是大的刺激。这也种下了他反对封建家庭压迫制度的根吧，虽然那时候说不出“封建”、“家长制度”这些名词。而在当时他和严厉独裁的父亲斗争方法之一，便是联合母亲、兄弟以及家里临时雇的长工，结成“统一战线”，以和压迫者对抗。同时他自己努力劳动，小心记账，这样，父亲也就没有指摘他的口实了。

到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渐渐改善了。当初，父亲让他读书，只是希望儿子能帮助他打赢官司，与人诉讼，儿子能引经据典，驳倒对方。因他曾经因为对方引了几句古书，使得他的官司打输了。到了现在，父亲看出了，泽东同志求学很有成绩，是一个大有出息的儿子。泽东同志也从外面寄钱和药物给他父亲，以表孝敬。

六 被压迫人们的少年同情者

毛泽东同志继续阅读中国的旧小说。他尤其喜欢读那些关于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故事。

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他周围的事物，分析他所读的书，并且作出结论来。

有一天，泽东同志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旧小说里面的人物，只有帝王将相，圣贤君子，英雄豪杰……而却没有他经常所见所接触的耕田的农民呢？这事他奇怪了很久——整整一年多到两年。后来泽东同志发现了：原来那些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半是一些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他们自己不耕种，占

了土地叫农民替他们劳动。

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怀疑与发现。自来多少人都读了那些旧小说的,却没有听说谁想到这个问题。但泽东同志怀疑了,发现问题了。这也可见他从小就肯用脑子,肯深刻地思想,善于思考一些很普遍的但为大家所不注意的现象和问题。同时也看得出来,他从小就常常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想在一起。

自从外国侵略加深,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随着渐渐地提高起来了。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曾不断地向强盗式的帝国主义,向专制腐败、压迫汉族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清王朝封建制度,作英勇的斗争^①。一八五一年(毛泽东同志诞生前四十二年)爆发了一次最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这一革命震撼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继续了十四年,它给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非常的巨大^②。

关于太平天国的种种,泽东同志的祖父辈还经常谈及。特

① 广东有平英团、升平社学等反英武装组织。福建、浙江、江苏等处都有人民反英的斗争。反清的武装斗争则有汉、回、苗、瑶各族起义及骚动事件,达百十次。太平天国后,南方有“佛山团练局”等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组织,有捻党、回民和苗民的暴动,有台湾人民的英勇抗日斗争……但都被清政府无耻出卖和残酷屠杀镇压下去了。

② 一八五一年,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出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在这里定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上,一直打到天津附近。太平天国革命的势力达到了十六七个省份,得到人民拥护。但因为农民阶级本身的缺点,到后来就内部不团结,组织不坚强,特别是美、英、法等国武装干涉,组织了所谓“常胜军”(或名“洋枪队”),先后由美国人华尔、白齐文,英国人戈登率领,极力帮助大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残酷地屠杀中国同胞,太平天国遂告失败。

别是大汉奸、大刽子手、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创办湘军，和太平天国作对，残酷地屠杀同胞，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者组织什么“洋枪队”，参加镇压太平革命，他们的兵舰向太平天国的城镇开炮，使这次革命运动失败，这些事实给予湖南人民的印象特别深刻。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农民群众在天灾人祸逼迫之下，仍不断掀起斗争。

一个大荒年，毛泽东同志和一群小同学在私塾外面，看见许多米商从长沙回到乡下来。小孩子们问米商，为什么都离开了长沙。米商告诉他们一件事变：闹饥荒呀！长沙一个地方就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人！灾民们推出代表到抚台衙门去请求救济，但抚台的回答是：“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呢？城里米多得很。你们看，我每天都是吃得饱饱的。”灾民们听到巡抚这样的答复，骚动起来了。他们聚群结队去攻打衙门，砍断了衙门上的旗杆子——官厅统治的标志，赶走了巡抚。后来布政使^①一位大员（姓庄名赓良）骑马出来，“晓谕”人民说，政府正在设法救灾……于是灾民暂时散了。可是清朝皇帝却革了那个姓庄的职，说他“勾结乱党”。接着来了一个新的巡抚，他立即下令逮捕事变的为首者，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梟首示众”……

小学生们听了这个故事，议论了好多天。大多数对造反的也都表示同情，但只是采取旁观的态度，或只感觉得有兴趣而已。毛泽东同志却永久忘记不了这件事。他那时便觉得，那些造反的都是象自己家乡一样的善良的老百姓。没有饭吃而造反，该是对的。他的内心非常激动。而对统治者不管灾民的死

^① 布政使，衙门的称呼。

活，很抱不平，很是痛恨。后来泽东同志述说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时，认为这是一桩对他影响很为巨大的事件。

又一次，泽东同志本乡的哥老会^①的人和—一个地主发生冲突。地主到官府告了状。地主有钱有势，自然官司打赢了。但是哥老会的人不服，跑到山里，建起堡寨来。官兵去打他们。那个地主还造谣说，哥老会决定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小孩子祭旗……哥老会的反叛，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一个姓庞的铁匠——农村的手工业者跑了，但后来又被抓了回来杀了头。泽东同志和他的小同学们都同情这次叛乱，都称赞那个为首的庞铁匠是英雄。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乡下异常缺米，农民没有饭吃。富人却把谷米囤积起来，不肯平价卖出。穷人们就发起“吃大户”的运动——百十个挨饿的男女老少，都跑到富户家去，打开仓库，倒出谷子，就在他家里磨成米，就用他家的大锅煮饭吃。吃了这家又吃那家。

韶山冲本地出了一个“维新派”的教员李漱清，那时他反对迷信，打菩萨，办学堂，劝人用庙产兴学，以便传播科学知识。乡里不少人反对他。毛泽东同志却钦慕他，赞同他的意见，并经常向他请教（但泽东同志在八九岁的时候却曾信神，因为他的母亲是非常信神的，母亲生病时，他也去求神拜佛^②）。他的父亲不信

① 哥老会（以及三合会、青帮等），是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团体。这些组织的组成分子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曾经用这种组织去求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援助，并在一定时期中曾经用以发动斗争，去反抗压迫他们的官僚和地主。这种落后性的组织又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强势力所操纵和利用，加上他们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就变成了反动的力量。

② 十五岁时，他曾为母亲治病去南岳山“朝拜香”——即手拿小凳，走十来步就跪下去一次，嘴里还要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这样要走百来里路。（毛泽东同志所以也到过我生长的萧家冲，因那是朝南岳山必由之路。）

神，他还和母亲讨论过，如何劝父亲也信起来……后来读了一些新书，他对神开始怀疑了，到这时候，他几乎完全不信神了）。

这一连串的事情，给予了幼年的毛泽东同志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于农民的痛苦，更加关怀了。对于农民的群众行动，他不仅同情，而且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于统治阶级的行事，对于统治者拿来欺骗老百姓的神，都存着反抗的心思了。他同情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和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在一道。

在这时期，毛泽东同志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

七 年十五六而志于救国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一步一步地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①、^②。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进行着资产阶级性的改良运动。一八九八年，戊戌年，毛泽东同志五岁时，中国发生过变法维新运动，实行了百日新政，但结果是失败了^③。

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主张

是这样的：政治上变法、维新（还是维持君主，但主张立宪法，开国会等），经济上务农、劝工、惠商、建工厂、开矿山、筑铁路、造轮船、办邮政……军事上练兵、选将、购械，文化上废科举、办近代学校、设报馆、译外国书……梁启超后来自己办了一种《新民丛报》，那里面他写的不少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利。“丛报”有时论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的一些知识。毛泽东同志读了很是欢喜，更引起他救国的志愿。

甲午中日战争前，改良主义者之一郑观应作了一本书，叫《盛世危言》，也被从小就好学的毛泽东同志找来读了。书中提倡变法，设议会，行君主立宪制度……这种君主立宪主义和当时还有些其他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论时务的主张，对甲午战后的变法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都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就在于缺少西洋的机器工业，所以他们都主张修铁路，造轮船，设电报、电话……

那时他又读了一本书——《校邠庐抗议》^④，那里面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八九至五九〇页。

②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曾倡办军事工业，先后设同文馆，译书局，搞“洋务运动”，设外交机构，借洋兵助打内战，镇压革命，图所谓“自强”……不久这些措施全破产了。但受了“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开始发展了。当时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直接经营一些企业之外，中国一部分商人、官僚和地主向轻工业（主要是纺织与面粉业）投资。少许重工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

③ 这个运动，代表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利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首，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助，但缺乏群众的基础。当时拥有武力的袁世凯向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出卖了维新派的机密，于是慈禧太后重新攫取政权，禁闭光绪皇帝，并杀了谭嗣同等六人。这个运动就这样悲惨地失败了。

④ 《校邠庐抗议》，改良主义者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著。

毛泽东同志很喜欢这一类的书，它们比《四书》、《五经》现实的多。由于这些书，引起他再前进求学的志愿。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一天天加紧，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天天下降。

还是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帝国主义列强就有瓜分中国的阴谋。戊戌政变之后，瓜分的说法又盛行了。继续贪读自己所能找到的书的毛泽东同志，一天，读了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那里面讲到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主权的种种事实（几十年后他还记得书中第一页第一句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很为祖国忧伤，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救国的责任。毛泽东同志在这时期，开始决定自己的志愿。我们着重说，从这时起，他开始注意，研究，谋虑如何解放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问题了。

就由于这个志愿和求知欲，毛泽东同志自动地请本家的长辈族人去劝说他的父亲，不送他去湘潭县城米店当学徒，而准许他继续读书，到湘乡县一个“洋学堂”去受新教育。这时清政府已经废科举、八股而办起现代学校来了。由于奋斗的结果，十六岁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一〇年初秋，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韶山冲，自己挑着简单的行李，来到离家五十里路远的东台山下。

从湘乡县“望春门”出城，步下石梯，坐上渡船，过一道河（涟水），走着不很整齐的石块铺成的路，就看见前面右边一座树木葱茏、非常秀丽的山——“东台山”。距“龙城”^①约五里地的东岸坪，离山麓不远，有一所整洁堂皇的房屋，围着一道圆的、用烧砖砌成的高墙，前后有两道各两扇很厚的黑漆大门，这就是“东

^① 湘乡县城的街道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象征龙鳞，故又名“龙城”。

山书院”，这时改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毛泽东同志交了入学考试卷子——一篇作文，文题为“言志”，之后，学校的校长李元圃对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毛泽东同志进了这个“洋学堂”。

黄昏时候，圆锥形的东台山，和尖尖的白色的七层宝塔的影子，倒插在围绕着校舍的圆池里。

几个小同学和新来的毛泽东同志站在石桥上，靠着石栏杆说话。他们一时望望桥下的水，和在水中游泳的鱼；一时看看操场上一些同学在打秋千，跨木马，跑的跑，笑的笑……

已经好几天了，在一群小学生中间，在出进自修室、教室和寝室的时候，同学们看到泽东同志一个明朗的面孔，和善有神的眼光，瘦长的身材，穿着青土布的短褂子和裤子。他不象别的同学们（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得那么阔气：有时是长袍子，白的或绿的丝腰带，从青马褂后面靠左一点露出几寸来，青缎子薄皮底的鞋子，有时是时髦的学生装……不，泽东同志只有一套比较体面的粗布衣服。听他的口音不是湘乡人，他说：家本在湘潭，但母亲是湘乡人，外祖父姓文……讲起这些时，有几个人一面看不起毛泽东同志的穿着，笑他是个“乡巴佬”，一面对他说道：“呵，你既不是湘乡人，就不能在这学校念书，你非多缴一些学费不行。”……但有少数的同学和他很好，那就是家境也贫苦，穿着也不阔气，而认真求学上进的学生们。

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在陕北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那时我也有学生作朋友，有两个同我特别知己。这两个之一，有一个现在已成为作家，住在苏联。”这当然指的是本书的作者，另一个记得是国文教员的儿子。

毛泽东同志说话慢慢的，态度很谦虚、诚恳、大方。在学校

里他进步很快，教员们都喜欢他，特别是教经学和国文的教员们，因为泽东同志的古文写得很好，经学也有根底^①。

这个学校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由教员出题目，由学生各自作一篇文章，作完后整天休息。毛泽东同志每次都认真为文，成绩很好，他写的“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全校有名。

每天早上，学校里集合学生们点名的时候，校长常向学生们训话，有时讲一点中国一天天贫弱，遭受列强欺侮的时事。小学生们听了，大都愤激。学校里有一位教员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讲起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富强，日本及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泽东同志听了，更为中国忧虑。

在东山学校里，毛泽东同志也是自己找书读的时候多。他最喜读中国历史，也读了些外国历史、地理的书。此外他继续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他读了又读，差不多都能背诵得出来。那时候他非常崇拜康、梁。

有一次，也是黄昏时候，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泽东同志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一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泽东同志和蔼地问。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把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象犯了错误似地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① 他那班的国文教员是贺楠(音南)纲，很喜欢毛泽东这个新学生。因为他爱研究历史，贺先生特地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毛泽东同志。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毛泽东同志读一切书都很用心，常在书上打圈点等记号，写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泽东同志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①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①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是明末清初一个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优秀的学者。人们称他“亭林先生”。

第二章 卷入辛亥革命运动的漩涡

八 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

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都谋虑着,如何抵抗外国侵略,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除上章所述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之外,在中国发生了一个革命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运动,它的领袖是孙中山。

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那一年,一八九四年,孙中山组织了一个“兴中会”。它的目标是反对清朝,复兴中华。此外,章太炎组织了一个“光复会”;黄兴组织了一个“华兴会”。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刺激了中国的先进知识界,他们感觉到革命团体之间的团结之必要。一九〇五年,“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名叫“同盟会”。

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可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第一个阶段的高潮时期。同盟会成立后,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的形势一日千里”地发展着。全国各地差不多每年都有反对清朝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在四川发生的“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是一个大的爆发点。这时革命的风潮普遍到了全国。终于在这年的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树立了革命的旗帜。一九一一年,阴历是辛亥年,因此这次革命又叫作“辛亥革命”。

就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一九一〇年冬,毛泽东同志到了

长沙。

泽东同志在东山学校只住了半年。他开始想到更远更大的地方——长沙去。他请了东山的一位教员介绍他到长沙省城里一个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去投考。他由家里步行走到湘潭县城（这里他曾经去考一个高等小学，那学校的校长说，他太高了，不收），然后挤在湘江小火轮的统舱（即三等舱）里去长沙。他心里兴奋极了。长沙果然很热闹。他只害怕不能进那个他在当时认为了不起的“驻省湘乡中学”。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很顺利地就被学校录取了。

泽东同志到长沙时，自立和找出路的精神很强，进步很大。但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自处朴素，待人谦和。

在长沙，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看到一种报纸——《**民立报**》（同盟会办的）。那里面登着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言论，载着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反抗清朝起义而牺牲了的故事。毛泽东同志读了之后，非常感动。同时他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他很兴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大胆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政见。他主张，应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新的政府。自然，他那时候还并不知道康、梁和孙中山主张的区别，只是混沌地意识到：讲维新，干革命的人们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去共同反对清朝的专制独裁和丧权辱国。

自从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清政府只知对外妥协屈服，对内加重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大众已不断作反清、反苛捐杂税、反饥饿的斗争^①。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其实是将路权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运动开始发动了^②。人民反对清政府独裁，要求立宪和请开国会的运动，也普遍地展开了^③。

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个人恐怖行动，也愈来愈多了^④。

自从太平天国以来，湖南的革命与反革命、维新与守旧的斗争，素来非常激烈。新学在湖南亦开展的最早。在变法运动中，

-
- ① 辛亥革命以前反苛捐杂税运动几遍全国，即以一九一〇年来说，较大的计共数起。例如，广西归顺县几百个村子的农民反对抽捐运动，河南叶县万余人民反对加税，山东莱阳几万人的反苛捐反劣绅运动等。
 - ②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朝宣布“铁路国有”，湖南绅商首先提出反对，鄂、粤、川各省士绅商民继起联合抗争，川人以拒付租税为抵抗，以后四川、广东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和本地清政府武装冲突，许多地方曾罢市、罢课、罢工（筑路工人），旅美华侨也通电反对……这个铁路商办运动，和当时东三省的主权收回运动，直隶、山西、河南的煤矿收回运动，安徽的矿约废除运动，云南的矿产收回运动……都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清政府出卖国家权益的运动。
 - ③ 当时全国各地组织很多的立宪团体：梁启超组织东京政闻社，号召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要求清朝实行立宪。江浙一带有预备立宪公会，湖北有宪政筹备会，湖南有宪政公会，广东有自治会，张謇、汤寿潜等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不断向清朝政府请愿，要求实行立宪。清政府不得已，只好采取欺骗办法，先后两次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九〇六年九月下诏预备立宪，但在上谕里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分明是不愿意人民有政权。一九〇七年又设“谘议局”于各省，但规定它的宗旨只是“遵谕旨采各省之舆论，指陈各省利害，筹划地方治安”，这当然也不是民意机关。一九〇八年九月又颁布了钦定的“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君主还是有莫大的权威，人民都不满意。一九〇九年各省谘议局代表向清政府请愿召开国会，被拒绝了。一九一一年四月清廷又颁布新内阁制，但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是皇族权贵奕劻，全国舆论大哗，谘议局联合奏请另简大臣组织内阁，受到清廷的严厉申斥，人民大众愤恨，上层士绅和新官僚们也大为失望。
 - ④ 一九〇〇年兴中会联合了三合会在广东惠州举行起义，一九〇六年同盟会与哥老会联合在湖南浏阳起事，萍乡的矿工起来响应，一九〇七年有黄冈之役、惠州之役、安庆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一九〇八年有河口之役，一九一〇年有广东新军的哗变，但都先后失败。

湖南的谭嗣同、唐才常等都是维新派中的较左的。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都是维新派，与谭、唐等合作，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筹办水陆交通，开矿，设武备学堂，练民团。又设“南学会”^①，会员千数百人，“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策，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②；出版《湘学新报》（旬刊）、《湘报》（散为日报，合为月报）。一时湖南成为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份，有“小日本”^③之称。

同盟会组织分子之一——华兴会，其领导人黄兴，是湖南人。他又是黄花岗起义的领导者。这次七十二烈士之牺牲，以及在安徽起义的徐锡麟和秋瑾（女）之被杀，引起湖南人民很大的波动。反对“铁路国有”运动，湖南人是首先倡导的。立宪和请开国会运动，湖南亦不落人后，并有不少激烈的行动。

另一方面，湖南的人民群众掀起了自发的斗争。一九一〇年四月湖南米荒。富商们投机，囤积居奇。大劣绅们反对举办平糶。因此，在长沙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参加斗争的人数超过两万以上。——这件事曾经引起国内外大的震动。

① 南学会是湖南新政的最重要部分，“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梁启超，《谭嗣同传》），每七日一次大讲演，演说稿在《湘学报》发表，学会在省城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等为分教，学生四十人，都是有志青年，他们的排清思想，实已超出改良主义的范围，他们赞美民主，又已超出君主立宪范围。梁启超作的《戊戌政变记》说，三年内全国设立学会、学堂、报馆共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学堂十九，报馆八；就地区说，以湖南为最多，共十六所。

② 见梁启超，《谭嗣同传》。

③ 当时国人都很羡慕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强盛。他们称赞湖南的新兴气象有点象日本的维新，所以这样说。

革命浪潮逐渐深入群众了。从一九〇三年上海爱国学社的“爱国风潮”开始，知识分子积极推广反清的宣传。到了这时候，各地学校的师生都动起来了。他们办夜校，出小册子，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现在学校里的同学愈来愈激烈了，大多用剪去辫发的方式，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的情绪。毛泽东同志在湘乡中学和一个朋友首先自己剪去辫子，并且动员别人也把辫子剪掉。

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驱逐鞑虏（指清王室），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已普遍地印在人们的心里。革命党人的活动加紧了。人民要求革命已很迫切了。年青热情的毛泽东同志立即卷入了这一革命运动的漩涡。

九 干革命——当兵去！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之后，长沙城里形势紧张。城门口，大街照壁上许多地方都贴出了湖南巡抚的告示，宣布戒严。但是革命党人仍然在城内外各处秘密活动——有的在学校里演说，宣传反对清朝统治，有的讲排满兴汉；有的在城外鼓动新军反正……

一天，驻省湘乡中学的校长允许一个革命党人来到学校，作了一篇激烈的演说。当时就有几个学生起来，拥护他的说话，痛斥清政府，主张建立民国。会场里的人一个个紧张得气都不出了。

毛泽东同志听了这次演说之后，非常激动。他心里想，自己对革命不能袖手旁观，非参加不可。四五天之后，他下了决心：要干革命，最好是去当兵。于是决定到湖北都督黎元洪部下当革命军去。他从同学那里募到了一些路费，又约好了几个朋友

准备一道去武汉。但就在这时，长沙城里也起了革命。武昌起义之后，首先响应的就是湖南长沙。

原来，在湖南的新军四十九标和五十标（标等于现在的旅）里面，已经有同盟会和哥老会^①的人在活动。黄兴是他们的领导者之一，但这时不在湖南。湖南哥老会红帮的头子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湖南的新军里已经作了工作，运动这两标人反正，响应武汉。

那是十月二十二日（阴历九月初一），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新军由城外协操坪向长沙城的小吴门开来。放了一排枪。一队人往荷花池去打军械局。大队就从小吴门进了城，直奔抚台衙门。抚台衙门的卫队也没有抵抗。平日威风十足的“抚台大人”余诚格被迫投降，但终于在后墙挖了一个洞逃跑了。一会，巡抚衙门挂起了很大的白布旗子，旗的正中有墨写的一个大“汉”字（还是逼迫余诚格写的）。渐渐城内各学校、各机关、各商店也都扯起或大或小的白旗了。有的上面写个“汉”字，有的没有写。毛泽东同志从街上回到湘乡中学的时候，校门上已经挂起了白旗，门口站了几个兵士。这样，湖南就向清政府宣告独立了，光复了。到了下午就听说焦达峰和陈作新被举为湖南的正副都督。这天天气阴霾，人人心情紧张，但过了一会之后，立即觉得轻松愉快——革命原来是这样“容易”的！

革命刚才开始，清朝还没有被推翻，还要打仗。长沙城里这时很活跃。一面派兵去援助武汉，一面添招新兵。热心的青年

^① 这种旧形式的民众组织——会党和新军是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盘。会党或会帮实际上是当时农民和手工业者最广泛的原始组织，是同盟会的主要力量，因此列宁曾说过：“‘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九六页）

学生们成立了学生军。毛泽东同志参加革命军的志愿没有改变。但认为学生军的基础不好，他不去，他决定参加正式军队，切切实实地帮助完成革命。因为他想，要革命成功，就必须打仗，当兵是干革命最好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这时只有十八岁，但是他的身材已经相当高大。如果那个湘潭高小的校长嫌他太高了，不收他；那么现在当兵却高的好。收下了，入伍了。他入伍的这一连新兵驻扎在审判厅里面（审判厅也还没有开始办公）。大家住在那里，除照常操练操练和作其他一些杂事——当连排长搬住房的时候，兵士们要替他们抬床铺板，背被包、网篮之类的东西——之外，每天要到长沙城外白沙井去挑一担泉水回来，给大家煮饭及官长们泡茶用（这种水通常叫作“沙水”，有一首对联，上款是：“常德德山山有德”，下款是：“长沙沙水水无沙”）。

在队伍里，毛泽东同志和所有的士兵以及官长都相处得很好。他们有要寄信回家或给朋友的，就找毛泽东同志帮忙写。他都不推辞，耐心地帮助大家。他又和同班排的弟兄们时常谈话，问他们的家世状况……他们大都是诚实质朴的农民，也有挖煤的矿工、铁匠等工人，泽东同志很喜欢他们。士兵们都认泽东同志是自己的好朋友。

一〇 注意时事和社会问题

那时新军里每月给士兵发七块钱的饷银。别人得了饷就上街吃、喝、玩去了。有的就寄一部分钱回家去。毛泽东同志关了那七元饷，除了吃饭要用二元以及买沙水（自己不去白沙井，而向那些专门挑水进城出卖的人买）要费一点钱外，却别的什么也

不花，只是自己订下几份报纸，每天一有工夫就读它。

还是在入伍之前，在湘乡中学的时候，泽东同志就喜欢看报，以后渐渐简直成了“报癖”（有人这样笑他）。每张报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觉得，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特别从这时起，他就注意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

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倒后，中国的政治思想，一时颇为解放，也颇为混乱。除同盟会——国民党外，当时曾产生过许多的政党，如“自由党”、“进步党”、“社会党”……这些党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存在的日子较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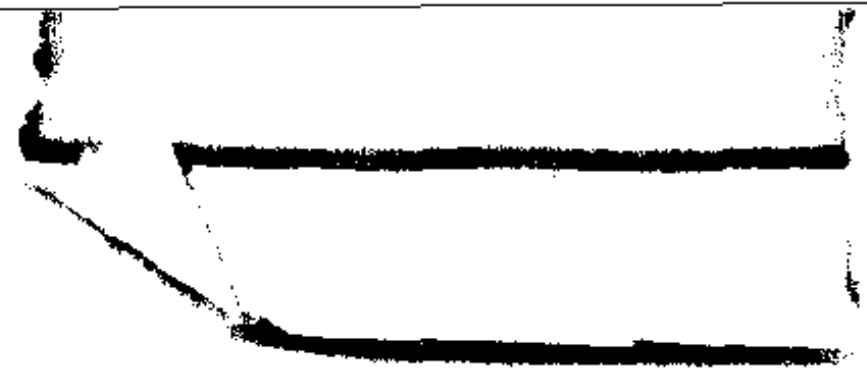
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在报纸上读到了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还看到了几种论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在当时是非常微小的、点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作者也只是道听途说地转述了一点，或者只是从外国文翻译了一些词句，所论当然极不详尽，而且大都掺杂了些社会改良主义。但对新鲜事物极富感觉的毛泽东同志读了之后，满心欢喜，非常赞成。他立即和学生及兵士们谈论社会主义，认为是救人救世的最好的道理。

本来，他离开东山学校已经有一二年了，但还时常和旧日的同学们通信。现在他兴奋得很，把在报上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写信告诉旧同学们。

武昌起义后，长沙首先响应。接着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山东、四川先后独立。在一个多月内，革命军占领了十六七省。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很快就倒了。但当时它还想作最后的挣扎，企图用再度让步的办法，来缓和革命——颁布宪法十九条，

对君权大加限制,任命袁世凯组织内阁,作内阁总理大臣……谁知道这个大地主大买办反动派的首领袁世凯,凭着他所掌握的北洋军队的实力,一面取得了清朝的全部权力,一面派兵反攻武汉,占领汉阳。他给幼弱的革命以重大的打击,但立即又停止了军事行动。这样,武汉是稳住了。原拟困守南京的张勋也被打垮了。民军(新军改的名称)占领了南京。革命方面在上海召集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移到了武汉,现在来到南京。就在这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制订了“临时约法”。

在这时期,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工人运动已经加强起来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形成。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中国人民不断斗争,中国无产阶级也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了。但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还很弱小,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切革命的民众,都散漫无组织,自觉程度还很不够;主持、参加及附和革命的人们,阶层不同,目的不同,相同的只有一个目标:反清。除此之外,利害极不一致,而且矛盾百出——一句话,革命方面的阵容是非常软弱的。由于这种种原因,革命的果实竟落到了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旧军阀、旧官僚的手中去了。这些阶层的代表袁世凯,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窃取了一切(湖南的都督也早就换了地主官僚的代表人谭延闿,起义有功的焦达峰和陈作新都被他阴谋杀害了)。参加及附和革命的各种上层人物都和袁世凯妥协,都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主张南北讲和,中国“统一”。条件完全照袁世凯的意思:清帝退位,孙中山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南京政府宣布解散,“中华民国”的首都还是在北京……孙中山本来是不赞成这些办



法的,但那时很多革命党人也都存着升官发财的思想,赞成无原则的妥协调和与“统一”,孙中山那时简直孤立了。后来他曾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是的,这次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流产了,虽然它在中国第一次推翻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专制皇帝制度,摧毁了清王朝在中国的民族监狱;这个民主运动,反帝、反封建、争民族独立自由运动的初步胜利,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对世界文明历史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在南北议和,中国“统一”之后,毛泽东同志决定退伍。他对于这种“革命”很为失望,决定继续求学,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将退伍的意思一说,连排长们都挽留他,并且说,当兵能有出路,意思是,能升官发财的。但毛泽东同志不愿再留,结果,还是离开了兵营,开展他此后继续求学自修的生活和初步的社会活动。

第三章 他是怎样认真学习和刻苦锻炼的

—— 要求学还是靠自修

辛亥革命后第一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从兵营里出来，决定继续求学。那时候湖南办了许多学校：各种实业的、商业的、法政的……什么都有。毛泽东同志先后投考了几个这样的学校，但都不满意；有的住了一个来月就退学了。

再继续看广告。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向省立第一中学报名。去考了。过几天去看榜，取了第一名。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欢迎这个考第一名的新生——毛泽东同志。但怀疑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作的，再举行面试。结果证明，两次都是他自己写的，都的确很好。于是大家对毛泽东同志都非常称赞，要他一定入校。毛泽东同志也就进了这第一中学。但中学的课程对他是很有限制而肤浅的，学校规则也颇烦琐，不能使他满足。因此在这校住了半年，他又走了。

但第一中学有位国文教员很喜欢和帮助毛泽东同志，认为他具有文学的才能和倾向。这位先生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他看得很有趣味。也由于看这部书，他觉得，自己读书，自己研究，比进学校更有益处。于是毛泽东同志定了一个完全自修的读书计划。

长沙城里有个定王台，并不很高，站在台上也望不了多远，

但有楼，这时改为图书馆。楼上放置各种中外书籍。楼下大厅为阅览室。这里有花园，院内有不大的金鱼池。这是湖南第一个省立图书馆，这时开办不久，每天去看书的人也不多。但每天一开门，就有一个青年人，个子高高的，穿着朴朴素素的，不急不缓地走进馆里来。他取到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前用心地看，简直就不休息，一直到要关门的时候才出去——天天如此，风雨无间。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他在这里非常专心地用功读书，整天内就只在中午时候出去买几个包子或饼子充饥，就也算是他休息的时间。“一到了图书馆，就象牛进了菜园”（泽东同志自己回忆这个时候情景的话），什么书都找来读——中国的经史子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在这期间，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和《社会通论》等，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总之，凡是当时从外国文译成了中文的名著，他差不多都读遍了①。

①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六页）

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他又说：“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七页）

在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大的《世界坤輿大地图》，泽东同志过这里时，一定要在它前面站立许久，以极大的兴趣仔细地看它，他觉得天下人世真大，他的眼界也开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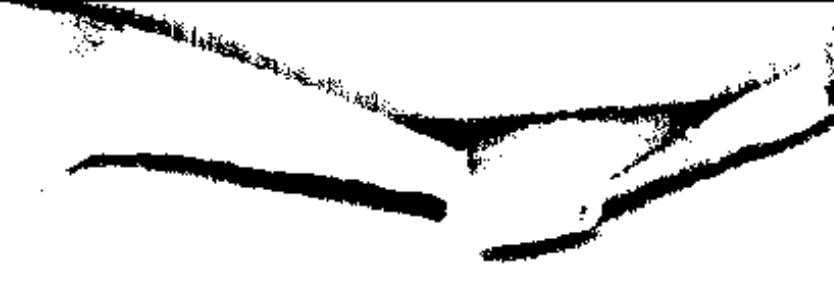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白天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回“湘乡会馆”住宿，中午吃几个包子或饼子充饥。这样勤谨而贫苦的生活又过了半年多。在这他自认为极可宝贵的期间内，无疑地，得到了许多学问。

但是他没有钱用了。不进学校，不谋职业，在家里看来，这是不正当的，因此不给他接济了。会馆也不能住下去了，得另找栖身之处。同时他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宜于教书。于是二十岁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三年春考入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这里的国文教员和校长，很称赞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说一些中学教员很少能与之比美。这年的秋季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同志被编入第八班。他在这里住了五年又半（一九一三初——一九一八夏，因为第一师范秋季始业，他多住了半年），直到毕业。

一二 博与专的学习

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有块地方，原名“书院坪”。这里前临湘江，遥望岳麓，左通铁路（京广路的粤汉段）。长沙仅有几个新兴工业如电灯厂、炼铅厂、制币厂……都在附近。过了铁路就是农村。在这书院坪里新建了一座西式的楼房，规模颇大，堪称堂皇。铁栏杆为墙。外面临街筑有一条不很宽的马路——这便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它的前身是“城南书院”^①，后改为

^① 城南书院，是南宋张栻（号南轩）讲学的地方。那时朱熹在对河岳麓书院讲学。到两处来学的有几千入。



“中路师范学堂”，此时改为现名。在五四运动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师范对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常起着领导的作用。湖南学生界、文化教育界的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大都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倡头的。第一师范的很多学生和个别教员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也作青年学生运动，也作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后来他们之中很多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优秀干部和领导人物。这些都是和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求得了学问，取得了初步社会活动的经验。在这里他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了。在这时期，显出来他是一个组织家，是一个群众的领袖。在这时期，他团结了同学同志，使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

毛泽东同志进了第一师范以后，仍然是非常好学的，但还是以自修为主。他经常读书不倦，真是所谓“学而不厌”。同学们很快就都佩服他的才智，他的严肃治学的精神，他的朴实、诚恳、谦虚的态度。他的作文一出，全校轰动，教员把它贴在学监室的对面走廊墙壁上，课余时，那里围满了人，在读着传观的文章。但毛泽东同志并不自恃聪明，或者骄傲自满。相反，他的求知欲非常之强，肯用苦功。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在那通夜不灭灯的走廊等处看书。他也曾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

毛泽东同志在学校里虽也照例上课，但有时简直不上课。因为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注重自修。当抓住一个中心问题时，即专门研究它，一切别的杂乱功课就都不管了。他喜欢社会科学，根本不理其他不切实用的功课（这是与他的特别关心社会政治问题有联系的。后来他又曾专心研究自然科学，认为不应

当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割裂开来)。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把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找了来,继续不断,一本一本地研究(按:直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对于学习历史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向同志们作的讲演、报告与论文中,他再三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他自己的历史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非常混乱,学与用常是脱节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实属误人子弟不浅。泽东同志是反对那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他主要地是靠自己发愤求学,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凡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名著——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外国人著作的翻译,哲学,文学……他无不浏览。

在任何环境内能自己读书的习惯,泽东同志是养成了的。他曾故意蹲在人们来往嘈杂的城门口看书,以锻炼在闹中求静的本领。

一三 学问,学问,好学还要好问

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同学影响很大。他特别器重泽东同志,师生之间互相爱敬,关系很深。杨先生是长沙人,在第一师范教修身、伦理学、论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他对学生常灌输一种正义感;提倡高尚的道德,远大的理想,作有益于社会的人。他曾在日本留学六年,又在英国留学三年,但始终不离中国的理学传统,喜讲周、程、朱、张,喜讲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的著作《爱弥儿》……杨先生的修养很高,却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到听讲者很大的注意和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他的讲学精神,使得在他的周围,形成了

认真思想、认真求学的一群学生——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①、陈昌同志^②……等。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求学问道。杨先生是诲人不倦的，对这些优秀的青年，非常关怀。他对他们讲中国及西洋的哲学，讲青年的前途，人们应有的人生观、世界观或宇宙观……他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但他追求新的思想，并且努力实践，生活刻苦、严肃，和他的“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等等，那时对毛泽东同志等的影响颇大。

杨怀中先生对学生们讲戊戌变法中被杀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并讲他著的《仁学》。毛泽东同志尊崇他冲决封建罗网，反对唯心主义理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不赞成他的改良主义。

史学、文学之外，泽东同志对哲学是最醉心研究而很有心得的。

毛泽东同志的求知欲是非常发达的。在第一师范时，除在校自修及找本校的教员问学外，长沙城里不时有从外省来的所谓名流学者，泽东同志常一个人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虚心请教，想从他们得到一些新的知识。访问回来之后，他又常向同学们谈论他对于被访问者的印象，并加以自己对他们的批判。

长沙城里曾有人组织过“船山学社”^③，每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泽东同志邀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

① 参看本书第六八至六九页。

② 参看本书第六八页。

③ 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名夫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时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学说具有民族革命意识和唯物思想。“船山学社”每周逢星期日举行一次讲演，宣讲王船山的学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求学时也曾去听过讲。何叔衡同志是该社社员，后来并担任过社长。

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他常对人说，“学问”二字连起来成一个名词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

一四 读书的“四多”方法

毛泽东同志又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他自己就是“四多”方法的实行者。除上节关于“好问”之外，他实行多读、多写与多想。

所谓多读就是除“博览群书”外，尤其重要的就是对每本书或每篇文章多读几遍。幼时他读《饮冰室文集》，尤其是后来读韩愈的古文和唐宋诗词，无不读到能背诵出来。他爱读诗，能背诵四百首古诗，常抄写诗，晚年又练字又写诗，他到老喜欢唐诗中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色彩，自己写诗词也富这种精神，可说是气势磅礴而又精美。

多写就是课堂听讲写讲堂录，课后自修写读书录，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经过多年的积累，这种笔记本共有几大网篮（现在仅存的几本笔记本是乡人从灰烬中抢救出来，珍藏下来的。有一本一半是抄录《离骚》、《九歌》的全文；一半是讲堂录）。

多写的又一项是他看书时写眉批等等。例如一本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不过十万来字，毛泽东同志在书的眉头上却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中有些比较简单地表示赞成、反对、怀疑的话，有很多地方则是根据先秦

诸子、宋元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诸人学说，加以综合、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所发挥和批判的很多崭新的意思，常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眉批的墨迹也有两种到三种，有些对前面的批语又加以批判和补充，足见他是真正做到多读、多想、多问，故而多写。

自从袁大胡子(吉六先生)劝他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后称韩文公)的古文之后，毛泽东同志自己买了一部韩昌黎全集来读。白天朗读之外，晚上熄灯后就在寝室内不全灭的灯光下读、默诵。然而他并不一味盲从，读各种书时写着批语：“此论颇精”、“此论甚合吾意”……他认为道理不对的地方，就批上“不通”、“荒谬”，或打叉，打杠。

一五 “特别”学生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住校时，除少数几门功课，比方杨怀中先生的讲课及国文课……之外，有自己的学习计划；一般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而专读自己选读的书。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是品行不正，几次决定要开除他出校，都经正派教员阻挠，未能实行。

有一次因反对一位有私心的顽固的校长，泽东同志写了一个宣言，举出他的办学不好，贻误青年……写的理直气壮。有人告密，那篇文章是泽东同志写的，校长要开除他。经杨昌济、徐特立^①、方维夏^②许多先生再三说项，杨先生说他是特殊的学生，他顶聪明，不能让他失学，才免于开除。教国文的袁吉六先生，大胡子，也出来担保。袁先生很器重毛泽东同志，但起初不赞成他的“梁启超式”的文章，说那只是半通，要他攻韩愈等唐宋

八大家……“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作一篇精通的古文”——毛泽东同志后来对人笑说。的确，毛泽东同志的古文，真是气势磅礴，文笔神彩为一般人所不及。

还有一次学校要开除他而没有实行，是因为有名的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给说保了。毛泽东同志那时并没有着重研究数学，但王先生仍是器重他。学校放假期间，泽东同志不回家去，留住长沙城时，还曾在王家住过，也并不是学数学，王先生却供给他食住。

他的姨兄王季范先生在第一师范当学监，劝他上课，因为要照顾学校规则，泽东同志说：“那我就要向教员提出各种问题，教员答复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下台呢？”

不守腐朽的校规，他采取消极的态度。但自己发愤求学，锻炼身体，兼作各种活动，毛泽东同志却是特别积极的！

一六 锻炼身体，锻炼意志

杨怀中先生对学生们的影响不仅在讲学上，而且在生活规则上。他反对封建的腐败生活，提倡民主的科学的新生活。他废止朝食，行深呼吸，成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青年热情的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也模仿他。大概有一年多光景的时间，他

① 徐特立同志，那时在长沙各校教教育、教授法，热心教学，自处非常俭朴，是毛泽东同志和同学们所敬爱的教员之一。

② 方维夏同志，湖南平江人。早年留学日本，那时在校教植物学，又作过学监主任，作事很认真，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界的革新人士。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北伐军第二师的党代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工农民主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在湘赣边区工作时牺牲。

们都不曾吃早饭。一个暑假期内，毛泽东、蔡和森和张昆弟同志^①三人同住在长沙对河岳麓山下，读书、休养，每天吃新蚕豆加大米饭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这当然也有节省的意思在内，因为他们都穷呵。在那里他们常去爱晚亭云麓宫等处散步、爬山，每天清早在山上运动跑步，然后下来去塘里或河里洗冷水澡。这样继续到假期满后回校，到冬天十一月里还不停止露宿和冷水浴。这种“抵抗卫生”的办法这样逐渐实行下去，对身体是很有益处的。

毛泽东同志等更扩大浴的范围：在太阳下面，在大风里，在大雨下，赤着身体让晒，让吹，让淋。

他们叫这作“日浴”、“风浴”、“雨浴”。

所谓“冷水浴”，毛泽东同志起初几个人，后来组织二十来人，每天清晨起来后就来到校内靠近手工教室窗口的一口井边，大家脱光衣服，只穿裤衩，一声令下，各人从井里提一桶桶冷水，从头浇淋全身。自己淋，也彼此对着淋。然后用毛巾擦干全身，擦到皮肤通红才罢。他说，这可使皮肤增加抵抗力，可使血液循环加快，可强壮筋骨，亦可练习勇气。“雨浴”则是遇有大雨，在后山操场上让淋，或在大雨中作远距离的行军。“日浴”是脱掉衣服在太阳光下让晒，或也作远足旅行。至于“风浴”则是在大风中到后山操坪，或到城墙上天心阁一带散步，让风吹身，并且自己大声叫唤。泽东同志认为这些方法，既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

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同志向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新青年》杂志投稿，题为《体育之研究》，文章是用文言写的：“体者为知识之

^① 参看本书第六八页。

载，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如舍。”泽东同志在文中设计了一套六段操法，采取体操、拳术和军事操练中有锻炼身体作用的部分，加以变通综合，顾及头部、上肢、胸、腹、腰、腿等部动作。所有这些和后来毛主席主张“身体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以及注意人民卫生事业都是一致的。

在岳麓山住的时候，他们只各有一条面巾，一把雨伞和随身的衣服。泽东同志常穿的一件“土地袍子”（灰布长褂），给人的印象最深。

岳麓山上有一首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云麓宫还有一幅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在这山上，在这背景下，毛泽东同志等一天早晚就是体操、读书、看报、谈论和思考问题。

夜里他们露宿，睡草地上，彼此离得远远的，怕呼吸的空气不好……回校后他们就在后面山坡上、操场里露宿，直到打霜以后。

关于上面所举的一切，毛泽东同志那时在自己的日记本子里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也可见他青年时代的抱负了。

此外，游息散步，登山游水，或长途旅行，都是那时毛泽东同志和同学们共同娱乐、调剂身心的办法。

后来在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邀集一些青年举行“同乐会”到湘江里去游泳，在桔子洲沙岸晒太阳。这也是

学生时代体育运动会的继续，但带着团结青年共同奋斗的意图。参加者一部分人渐渐抛弃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在这里请让我们引一首毛泽东同志自己描写青年时代情景的诗(词)。从这个作品，我们看出泽东同志的文学天才和修养，也看出他的雄伟的气魄，宏大的襟怀和崇高的情操。词云：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

一七 “游学”——开始作社会调查

一九一六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期间，邀同好友蔡和森同志一道，游历湖南几县。他们从长沙动身，各带一把雨伞。伞把上缠一条毛巾，脚穿一双草鞋，徒步游历了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半个圈而返，历时一个多月才回家。他们动身的时候，几乎不带一文钱，但走遍了许多地方。他们的办法是：遇到机关、学校、商店，他们就作一副对联，用红纸写好送去；人们就给他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住宿。这在旧社会叫做“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善于利用某些旧的形式来

作新的事业的毛泽东同志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农民问题在他脑子里，是从小以来就没有一刻放松过的呵。他一向反对死读书，主张活读书，即不是书本上的学问，天下国家万事万物都要学习。他响往着古人“周览名山大川……襟怀日广”的说法。他也很有意周游全国，但是他没有旅费，于是用变相的行乞方法，先游湖南。——我们说，这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罗曼蒂克^①（在这个名词之好的、革命的意义）上）的一面。

这次远行的路上，毛泽东同志写过几篇通讯，寄湖南《通俗日报》，用很深刻和明白晓畅而又幽默的文字，暴露社会上各种现象，如有一篇述他们在湘阴参观一个女子学校，校长、教员都蓄有胡子。毛泽东同志写道：“胡子之作用大矣哉！”

在路上他们到一处，吃一处，遇着寺庙，就进去和和尚谈天，给人家送字。有的农民起初有些怀疑，见他们又不象平常的游学先生，又不象大叫化子，还有的说他们是算八字的……但毛泽东同志等和农民一接近，农民就很欢迎，好好的待遇他们。沿途他们了解各县农民的风俗习惯，农民的生活状况，地主、佃户如何收租、送租的，贫农的痛苦等等。农民给他们饭吃，给他们住宿。万一找不到食宿的处所时，他们就露宿，吃山楂子、蔷薇果等东西。

一九一七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和另一个同伴萧子升^②从长沙出发，徒步去旅行，他们经宁乡，特别访问了何叔衡同志的老

① 英文 romantic 的音译，即浪漫主义者或浪漫派的，幻想的。

② 此人后来主张“温和的革命”，信仰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终于成了国民党官僚，作了几件有背于新中国利益的事，于一九七六年死在乌拉圭。

家，备受款待。经何叔衡同志的介绍，毛泽东同志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和这位农民促膝谈心。在何家留宿，然后继续出发，参观了宁乡有名的沩山寺，向和尚借宿，再前进，走安化。路远天黑，走不到县城，他们就露宿河堤，第二天才进安化县城。从安化又走益阳、沅江。一路上也是送对联、“打秋风”。在沅江时，因涨大水，就乘民船返回长沙了。他们不带一个钱，身边只有一把雨伞，一条毛巾和一双草鞋，但用乞食的办法，走遍各地回到长沙，还剩下一路上人们帮助他们很少的“路费”。

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同志一人从长沙步行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同学家里，他和当地农民共同挑水种菜，对农民宣传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的道理。他平易近人，语言通俗，没有一点架子，远近的农民都来找他。他针对当地农民没有栽树的习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你们为什么不替后人想想呢？他自己就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每天晚上陈家挤满了农民，他们都愿意和“毛先生”谈心。泽东同志在这里住了几天才又步行回长沙去。

毛泽东同志沿途吟诗、题词甚多。至今还有人能忆起有下面二首：

骤雨东风过远湾，
滂然遥接石龙关；
野渡苍松横古木，
断桥流水动连环。

× × × × × × ×

× × × × × × ×

客行此去遵何路？

坐眺长亭意转闲。(据我弟萧子风回忆)

净水拖蓝，
紫云反照，
铜钟滴水，
梅岭寒泉。(在安化参观紫云山等地题词)

一八 政治的头脑，科学的头脑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对于报纸的爱好。自从他到了长沙，看到报纸以后，他就是一个最勤最忠实的读报者。在第一师范的自修室里，楼上楼下灯光之下，人们都在咿唔念书的时候，你只要到那时学校里设在一头的阅报室去，总可以遇到毛泽东同志在那里看报。他注意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看报的时候，他带着地图去，对着看。

第一师范的校舍后面有操场，有不高的山丘。出学校的大门，往左边不远，有修好不久的粤汉铁路的一段——长株路。晚饭过后，同学们常到山上或者顺着铁路去散步，看火车开过去。有时他们往前面走到湘江的岸边，看水陆洲，看打鱼的划子、渡船……在散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同伴们讲述中国以及世界的新闻，有条有理，了如指掌。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期，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湖南曾经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对中国的侵略一天天加紧。国际上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打得很激烈的年代。毛泽东同志经常仔细地读了报之后，就好象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

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你的脑子真特别，”同学们惊叹地说，“我们同样也看了报的，为什么我们不如你分析得清楚呢？”

是的，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头脑在这时候已经很发达了。他善于分析、善于总结、概括、归纳——这又是科学的头脑，学者的头脑。他给同学们说时事问题的时候，常常联系到中国的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的事变。

第一师范订了上海和长沙的两份报纸，人数多，报纸少。毛泽东同志于是自己订阅一份。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他还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钉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他把在报上所见到的地理名字一个个都写上，然后对着地图看。写的是英文。同学问他：

“你这是作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我学着写英文；再则，我把世界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都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

的确，在上井冈山以前，毛泽东同志没有间断过看上海、北京、长沙的报纸，而且看得都很仔细。有时一张报， he 可以看几小时。报纸旁边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各国地图，每个地名都查得很清楚，并且牢牢地记住。

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是在专门研究地理，和专门研究历史时一样的办法——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不离其宗，一直到有了相当的成绩，才告一个段落。

由于从小就有这样“学而不厌”的精神，从青年时代就养成

了这种刻苦治学的习惯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了博古通今的人。他是非常博学的，同时他的学问又是很渊深的。

和世界历史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是宣传家、组织家，是战士，但同时还是学者。

第四章 “组织起来”的第一页 (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

一九 组织家的天才

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毛泽东同志的好学和为人，他的思想、言论、品行，他的自求进步，富有自信力和不可屈辱，勇于反抗不合理的事物的精神和谦虚诚恳的态度，他的俭朴的生活，豁达而又踏实的作风，引起同学们都对他表示衷心的钦佩。不少人受了他的影响也力求上进，向他看齐。他和同学友好们都以至诚相处，晤谈时只讨论学问、文章、道德品行和人民生活、民族命运等天下国家的大事，从不涉及个人生活琐事。他高高的身材，微微有点弓的背，郑重的大踏的脚步；有魄力的，但按部就班，又无表面铺张和个人出风头意思的活动；他的勤勉有恒的博览，精细深入的钻研；他的从容的、清楚的谈吐，略低着或偏着头听别人的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成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只要和他一谈，便一切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他的办法、主意之多，他的异乎寻常人的丰富的创造性，他的无穷尽的毅力、智慧，他的异乎寻常人的明确和敏捷的判断力与推测力，他的大刀阔斧而又精细的气魄与风度……得到全校师生的爱戴。在学校内部举行“人物互选”时，

全校十一班学生共四百余人中，以毛泽东同志得的票数最多。张昆弟同志为第四名。毛泽东同志的考语有敦品、自治、胆识、文学、语言、才具六项。其他当选者最多只有四项，其中具有才具者，除毛泽东同志外只有一人，而“胆识”和“语言”两项，其他当选者，没有一个人具备。只有毛泽东同志具备完全的六项。就是说，他是全校最优秀、最受敬爱的人，因此有的简直称他为“毛圣人”。

他在学校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二不谈家庭琐事，三不谈男女恋爱及色情的话。

他在长沙城里曾去过一个同学的家里，那个同学叫仆人去买猪肉，吩咐得非常过细——要买猪的什么部位，怎样形式的，叮嘱了半天，才叫前去。泽东同志此后再不和这个同学来往了。

有一次泽东同志对同学们说：

“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鼓励、发展、运用每个人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小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看他的长处。”

能看到并且鼓励、发展每个人的长处——这是伟大的组织家、革命家、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特长之一。

后来在参加及领导革命运动时，泽东同志曾说：

“无论跛子、哑子、聋子、瞎子，对革命都有用处。”

又后来他对同志们说：

“对一个同志，首先要看他的相同处——他革命，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看他的不同处——有缺点，思想意识上有毛病……”（在延安对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谈话）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的英明的干部政策，和教条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之打击坏的以“刺激”工作的办法相反，是表扬好的以推动工作。而对落后的，对犯了错误的，或误入歧途的，或尚未觉悟的，无论是党内同志或是党外朋友，他所坚持的方针是“治病救人”，“与人为善”。

二〇 学生自治团体 ——学友会组织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时，发起组织了一个学友会——原名“学生自治会”，并担任了学友会的领导工作。在这件事里，表现了他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能，这也可说是他的社会活动的开始，他作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始。他从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而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在这里得到初步的体验。当时湖南的教育界（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也大多如此），学校行政方面每每是非常专制，相当黑暗的。学校内一切活动都被禁止，都要受到镇压。学生们除了读死书外，休想有一丝儿自由作校内外（社会）的各种活动。这种情形第一师范却是例外。那时的一个校长比较开明，提倡学生自治。一贯站在学生立场上的毛泽东同志，素来拥护群众的利益，极力反对专制黑暗腐败的学校行政。同学们在斗争中看见他是有能力的，也知道他是经得起考验——决不中途妥协的，就都拥护他，推他为领导人。

原来，第一师范曾经有过“技能会”、“自进会”等组织。一九一五年改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

学友会的作用很大，很得同学们的拥护。校方开行政或教

育会议时，必定有学生的代表参加。学校行政管理机关的一切措施、决定，都要得到学友会的同意。学生群众有要求时，通过学友会向校方提出。一时学生的学习问题、生活问题、管理问题、课外活动问题等等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可以说，事实上全校那时四五百个同学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他一有号召，全体同学就都行动起来。

从一九一五年起到一九一八年毕业时止，毛泽东同志在学友会内都担任着重要的工作，或作文牍，或作总务（即总干事），并兼十五部之一的教育研究部部长。

泽东同志任学友会总务时，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活跃极了。购置新的图书杂志啦，开成绩展览会啦，体育运动会啦，集体游泳啦，自由演讲辩论会啦，各种专门问题的学术的研究会啦……热闹得很。开成绩展览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和字，引起很多参观者的注意，在批评簿上，参观者大都特别称赞他。

从学友会的工作里看出来，泽东同志的组织才能是超人的。他作事都有很好的计划，有很多的创造。同时他又是非常踏实、精细和积极负责的。学友会的重要布告他都自己写。学友会的“纪事录”，有许多也是他自己记的。

开学友会干部会议及学生大会泽东同志作主席时，他总是首先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大家争论不止的时候，他就起来把各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分析，批判，修正，或另提新的意见，大家都很信服。

演讲部（或雄辩部）的部长是陈昌同志。他很会演说，会鼓动，声音宏亮，语句有力。这是一个好学不倦，待人和善，日求进步的同学。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被捕，临牺牲的时

候，还作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号召人民继续奋斗，听者大为感动，甚至军警都掉下泪来……

学友会及其所领导的各种研究会，在第一师范继续到后来许多年，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还存在着。第一师范在湖南被称为“亚高学府”（湖南大学为“最高学府”），在社会政治运动上非常活跃，这些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一 和城市工人最初的接触

在毛泽东同志作学友会的工作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办工人夜学这件事。这是他一贯同情和热爱劳动者的表现，也是他接触、联系城市工人的开始。

泽东同志一向就不满意那时候的学校教育制度，觉得必须有所改革。同时他也经常想到，工人农民不能求学是不合理的，他们不识字是痛苦的。因此他现在很重视工人夜学的组织。

这件事的值得叙述，还因为后来泽东同志努力作工人运动时，首先也就是从办工人夜学着手。

第一师范原来办过夜学，那是教职员们发起的。但他们没有能坚持下去。于是由学友会负责来办，而且是归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学友会十五部之一的“教育研究部”来办。

南门外，第一师范附近，集中了长沙几个新式的企业：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此外，粤汉铁路的武昌——长沙一段和长沙——株州铁路的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毛泽东同志办夜学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工人和第一师范校内的工友。他亲自写了一个通俗的白话的广告，招收工人入学。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利的是甚么？就

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有说时事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学校夜学学生就无妨了。”

这个广告不仅在街上张贴，而且托警察所分发，又托一个在附近工厂工作的毕业同学劝导那里的工人来报名；但报名的仍然很少。毛泽东同志就研究原因，觉得办夜校的事，在长沙还是极少的，群众不容易相信；而且由警察代发广告，反而增加群众的疑惧。于是他就组织一批同学挨门挨户到工人们家里去动员、劝说。结果，报名来学习的有了一百二十多人。

夜学的课程都适合于工人的实际要求，不讲究形式。他告诉来学的人说：“每次上课，衣服随便，不必求好”……泽东同志动员同学们来当教员，并拿自己的热情，鼓舞大家下决心坚持下去。他自己亲自教课，担任“管理”。对教学的方法，他注意研究，一面试验，一面改进。关于夜学一切大事小事，泽东同志都亲自照料得周到、妥当——这些都可从当时的《夜学日志》和《一师校志》里看得出来。

泽东同志是这样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和工人阶级建立了初步的感情。夜学的学生和附近工厂的许多工人都认识、敬爱他们的“毛先生”，认为是他们的好老师，好朋友。这种

夜学，后来发展为一个比较正规的“平民学校”，对湖南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起了推动的作用。

办工人夜校又是后来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大力作工人运动的开端行动，同时又是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场所。

二二 最初的反军阀斗争和 第一次受军事洗礼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年，全中国陷入一个混乱的局面。革命和反革命继续斗争，这派和那派军阀不断地混战。曾经有过一时表面妥协的所谓南北“统一”，不久又成了南北对峙。由于地理和政治的关系，湖南就恰好当了军事的要冲。各系北洋军阀和南方各派军事势力，都要争夺这个地盘，作为南下或北上的跳板。南北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来时，以战胜者和征服者的资格，对湖南人民的剥削蹂躏，烧杀抢劫，非常残酷、凶恶。湖南人民遭受无穷的痛苦，群众不满和反抗的情绪一天天高涨。

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求学的时期，就曾亲身经历过许多次兵灾战祸和军阀的横暴统治，他就参加组织、领导湖南人民的反抗军阀的运动。

他的最初的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是反对袁世凯作皇帝。

“二次革命”^①失败后，一九一三年，恰好是毛泽东同志进师范学校的头一年，袁世凯派了汤芑铭来作湖南督军。这是一个残酷的军事冒险家和政治上毫无节操与廉耻的人。他在湖南三

^①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军队南下，压迫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由辛亥革命形成起来的势力，孙中山曾发动武装的反抗，但不久即失败，那时人们称这次行动为“二次革命”。

年之内，只据有案可查的，就杀了五千多人，因此湖南人叫他作“汤屠户”。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想作皇帝。汤芑铭称臣，劝进，同时禁止各报登载反对变革国体（由民主共和再变为君主）的文章。人们或者只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反对个别拥护帝制的人。毛泽东同志那时觉得，应该进一步作更大的群众反抗的表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学友会，把那时梁启超等人所写的反对帝制的文章，翻印成小册子，题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到处散发。这个巧妙的普遍的宣传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影响。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穿上龙袍，登位作皇帝，改元为“洪宪”。很快蔡锷就在云南起义讨袁，成立“护国军”。接着贵州、广西等省宣告独立，向川、湘出发。孙中山也派人在长江一带联络活动。袁世凯害怕了，作了一百来天的皇帝，就又取消了帝制，仍自称大总统。护国军还是不答应。粤、浙、陕、湘等省宣布独立。一九一六年六月初袁世凯忧愤病死。湖南早就有了驱汤运动，袁倒台后，汤芑铭自然得走。

那正是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无暇顾及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向我国进攻。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目的是要独占中国。到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覆。那时袁世凯要作皇帝，想取得日本的支持，五月九日就全部承认了。中国人民称这些日子为国耻日。

就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在一篇讲述时事的《明耻篇》中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同时又在一首五言古体诗中表述了同样的思想：“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

安得辞浮贱！”深刻表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国内仍然不断地发生事变。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只十来天张勋就失败了。黎元洪发通电，推冯国璋为大总统。

段祺瑞得日本的帮助，作了国务总理。他要改选旧国会，想这样来打击南方势力（国会议员多南派人）。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在广东成立军政府，树起“护法”（民国元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旗帜。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也加入“护法”。

段祺瑞为着夺取湖南，九月派他的陆军次长傅良佐到湖南来作督军。已经两次督湘的谭延闿在湘南布置军事，并向西南求援。孙中山派程潜自广东进入湖南零陵运动护法，桂军谭浩明也率部“援湘”。这样就开始了又一次内战——叫作“护法战争”。

在这种你来我去，兵马不停的环境里，长沙省城自然是很不安全的。各学校的校舍常有军队来占。教育经费减少，甚至停止发给。这样，各学校好几次只得“提前放假”，事实上是暂时停办，大多数学生各自回家。

第一师范的校舍是一幢很大的西式楼房。汤芑铭和谭浩明的军队都占领过校舍的一部分房屋。学生们只好挤着住在里面。

不久，学生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来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某些同学们第一次受军事洗礼。特别是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第一次显露了他的军事天才。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傅良佐被谭浩明赶走了。在傅走了而谭还没有到的时候，长沙城里是没有任何军队的，只有一些警察。

北洋军队还在继续由南向长沙撤退。省城及四乡秩序大乱，北军三五成群，公开奸淫掳掠。第一师范在南门外，就在铁路旁边。退军一定要经过这里，也许免不了占房屋，行抢劫……这时有一部分北军约四千人，退到猴子石地方，在河边徘徊。猴子石离第一师范只二十来里路。形势是很紧急的。学校里大家颇为慌张。毛泽东同志这时挺身而出，把“学生志愿军”^①，特别是同学中的体育运动员们组织起来，保卫学校。他们把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所有的门，作为障碍物，准备作战。胆小的同学们及某些教职员都伏在后面寝室的天井里，不敢动一动。全学校的人员都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

毛泽东同志看出，溃军的不敢一直进长沙城，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城里的虚实。他于是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警察都是湖南本地人），利用他们几枝真枪带头，用少数人扼守校后妙高峰上，将大部分同学分成三队，绕道分布在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黄昏时候，等溃军距离不远时，他命令警察放一排枪，其余持木枪的就鸣放爆竹，并且向溃军大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进了城，你们快缴枪吧！”

溃军这时又胆怯，又疲劳了，又因莫明城内虚实，不敢行动。毛泽东同志派人去和他们交涉，把部队引到第一师范前坪。毛泽东同志喝令他们放下武器，又喊令他们全体后退几十步。三、四千人都照他的口令作了。于是全校几百个同学都来收拾枪枝，搬进校舍去，结果堆满了一礼堂。当晚溃军就在学校前坪露宿。第二天早上向商会（商人害怕溃军进城抢劫）借得现银，给溃兵每人分发四元，遣散了。

^① 那时候学校里奉行“军国民教育”。学生志愿军是教学生受简单的军事训练的组织。没有武器，只有一些木枪。

一个全副武装的北军混成旅，就这样被解决了。这样，不仅第一师范校舍没有破坏，全长沙城也得以免于骚扰。事后，学校的师生们都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很久以后，在一次闲谈中，毛泽东同志笑说，他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湖南的局面仍然很坏。傅良佐败走后，冯国璋对南军下讨伐令。一九一七年末和一九一八年初，南军北军又在湖南大战。谭浩明在岳阳一仗败了下来，退回西南去了。冯国璋打算妥协，令谭延闿督湘。但段祺瑞等还是要打，派曹锟、吴佩孚、张怀芝、张敬尧向湘鄂进兵。一九一八年三月（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师范求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张敬尧进长沙。从此他在湖南作了两年多的督军。此人的残暴专横更加厉害，湖南人叫他作“张毒”。他的军队毫无纪律，到处杀人、抢劫、强奸妇女，湖南人民受害很深。他对一切进步思想和事业，极力镇压。教育经费停发，第一师范虽因毛泽东同志组织的警备队的保卫，照常上课一段时期，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毕业于此戎马仓皇之际。但上学期以来大部学校房屋被军队占驻、破坏。第一师范校舍第三次被军队占驻，而且此次时间最久。学生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连一顿也吃不上。许多学生回家去了，他们的家乡也被军队蹂躏。

人民群众愤怒极了。到一九一九年末、一九二〇年初，在湖南发生了“驱张运动”。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毛泽东同志。

二三 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

组织——新民学会

帝国主义的大战在继续进行。中国也被迫“参战”，结果，什

么也没有得到，只是把德国侵略的山东半岛转交给日本去掠夺罢了。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战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他们在我国划分的“势力范围”，还是继续有效。

国内军阀间的混战仍然不停止。每派军阀都勾结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作自己的后台老板。各帝国主义者也利用这些封建军阀势力来加紧剥削中国人民。

湖南仍然是南北各派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兵灾、匪灾(全省各县都发生土匪,湘西、湘南更多),再加上水灾(一九一五年全省三十四县被灾,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洞庭湖边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水灾不断),使得人民活不下去。

毛泽东同志亲眼看到国家民族这种危急的情形,从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进到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社会的观念。

在第一师范学习的这几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同学中间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也大都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贫苦的青年,懂得人民的痛苦,有的并且自己从事过劳动。他们都抱着远大的志向。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行事,给他的这些朋友们很大的影响,他自然成了他们的表率。他们经常研究求学为人的道理,讨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等问题。

在这时期,全国人民的觉悟渐渐提高了,对推动和促进全国青年群众和一般知识分子的觉悟,起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新青年》杂志,是在一九一五年开始发行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刊物。它反对封建的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主张“文学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古文,提倡白话,鼓吹科学和民主。这刊物到了湖南,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

同志,首先注意它,宣传介绍它。

在这种形势和影响之下,毛泽东同志渐渐想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和作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要联合更多的同志,并且结成一个团体,才有力量。

一九一五年暑假后,在长沙城的各个学校里发现一张不大的石印的启事,上面写着简炼的、美丽的几十行文字,约七八百个字。有一句是:“效嚶鸣之求,步将伯之呼”(引诗经上的“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和“将伯助于”句),^①下面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末尾签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泽东”三个繁体字共有二十八笔画)。

这个启事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照壁上也张贴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经过两年多的酝酿,结果组织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采“大学之道在新民”,及顺应新的潮流,提倡革新之意。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在湘江的对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家里(他家在溁湾寺租住的“为痴寄庐”),集合了十三个人(有些人未能到会,但也是基本会员^②)。在吃午饭的前后,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会章是毛泽东同志和邹彝鼎同志共同起草的。讨论时他向大家说明、解释,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显、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

^① 根据重庆四川外语学院教授、我弟萧子风牢记之句。

^② 据我幸存的日记,到成立会者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邹彝鼎、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明谛、叶兆楨、罗章龙,共十三人。没有能到会的有,陈昌、李维汉、周世钊、罗学瓚、熊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当时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共八人。但以上皆基本会员,故新民学会最初会员实为二十一人。(这页日记有照片,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出版,及其它刊物)。

透澈。就在这一天,学会成立了。大家推毛泽东同志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作副干事。

学会的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会规有“不懒惰,不赌博,不押妓……”等条文,含着一种实事求是、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的精神。这里重要的是,长沙城里先进和进步的青年们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了。

学会的会员,最初绝大部分都是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有少数其它学校的。渐渐不仅其它学校的有志青年,并有个别进步的中小学教员加入了新民学会。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

学会经常开会,讨论学术或时事问题。会员们大都精神奋发,努力上进。

新民学会对后来湖南以及整个中国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学会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内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著的活动者。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辉的页子。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被反革命杀害的、牺牲的(以大概先后为序):

郭亮同志,号靖茄,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精明能干,是湖南工人群众的优秀领袖,曾任湖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被派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长沙英勇地牺牲了。

向警予同志,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最能干的妇女领袖,能说、能写、能作。曾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五年冬去莫斯科东方大学

学习，一九二七年四月回国后在武汉市总工会、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深入工人群众。汪精卫叛变革命时，作省委领导工作。一九二八年春，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汉口法租界捕房所逮捕，同年五月一日晨解赴刑场，沿途演说，呼口号，在武汉慷慨就义，这一事件曾使得全国震动。

陈昌同志，号章甫，湖南浏阳人，生于一八九四年。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友，长于演说；后加入共产党，作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作水口山工会主任。一九三〇年从上海去湘西贺龙部，经澧县，叛徒告密被逮捕，解往长沙，严刑无口供，有个大地主愿保释他，他坚决拒绝，英勇地牺牲了。

罗学瓚同志，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同志同班。五四运动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湖南省委工作。在长沙作人力车夫的工作，曾让车夫坐车，他自己拉车走。一九二八年在浙江省委工作时被蒋匪逮捕，牺牲了。

张昆弟同志，湖南益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生于一八九四年，幼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因无力升学，在家耕田。一九一三年考入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志等志同道合，治学、品行在班上总是最好的。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与蔡和森同志等同被驱逐回国，即由北京中共组织派为铁路工作的特派员，曾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仍在北方做工人工作。一九二八年成立红军第五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后与贺龙同志一起创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于鄂西洪湖地区英勇牺牲。

蔡和森同志，湖南湘乡人，生于一八九五年，家贫，做过牧童、商店学徒，学过手艺。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和毛泽东同志是很

好的朋友。“五四”后组织中国青年们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己也和母、妹（即蔡畅同志）等同去，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和毛泽东同志通信，最先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遣送回国。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主编党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和森同志在党内不懈地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反对错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力排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坚持正确的领导，终使“五卅”运动获得了伟大的成果。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夏季任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导广东党的工作，不到两个月为英帝国主义探悉、拘捕，引渡到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被刺刀戳得稀烂。

夏曦同志，湖南益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湖南作学生运动，作由共产党所组织成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委员。曾任中共湘区（省委）委员，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犯过“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最后悔改了。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时牺牲。

何叔衡同志，湖南宁乡人。是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内最初的年龄最大的党员。一九二一年和毛泽东同志同道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之后，当时中央“左”的领导把他留下，他与人作别时泣下。他与瞿秋白^①邓子恢等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撤出中央红色区域时，被敌包

围,这时,他已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走不动了,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附近,敌人向他开一排枪,他坠崖殉难。

上述以及还有许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了的会员——他们的崇高的气节,他们的凛然的正气,他们的英勇伟大的革命事迹,永垂不朽!

假如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五四”时代,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那么新民学会就是一个核心的组织。它的会员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运动中都是有利的支柱。而毛泽东同志自然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到后来一部分最先进的会员,又切实地作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了。因此新民学会是湖南——不仅湖南——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起过秘密党小组的作用。而这些大都是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他的进步、正确的思想,大无畏的作风,形成了一种革命的风气和传统所致。

① 瞿秋白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秋白同志曾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的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曾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秋白同志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立三路线的执行。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了王明等“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三年到江西红色根据地,担任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江西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秋白同志在福建游击区被蒋匪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第五章 站在新文化运动—— 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哨

二四 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在那时候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过学的吴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法国作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另一方面，当时湖南(以及全中国)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后，就都因无力升学而觉得苦闷，听了勤工俭学的办法，认为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好机会。“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尤其是那时许多青年所向往的事。毛泽东同志与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四等舱(实即货舱)从上海放洋去法国。

这些青年北上南下，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同时在全国各省都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近千人，湖南即占三分之一。留法青年当中，有一批新民学会成员。他们同国内会员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就寻求革命

真理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无所不包的热烈的讨论。蔡和森同志在法国精心研究国际共运经验和马列主义，很有心得。留法一年以后，他在一封致毛泽东同志的信中，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明确的主张，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同时深入浅出、实事求是，因而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新民学会会员们互相勉励，交流思想和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斗争经验提炼着共同的革命主张。今天，重新翻阅新民学会会员通信录，重温里面的字字句句，真是使人无比激动。虽只十几个湖南青年六十年前的通信来往，它却是五四前后全中国革命青年思想和心理变化的真实写照，是当时各地马列主义小组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生动的纪录，是我党历史上一份不可多得的可靠史料，蔡和森同志等在法国以新民学会会员为基础，扩大组织，发展为“工学世界社”，联络了李富春、王若飞、袁子贞（华工领袖）等同志，并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工学世界社和其它勤工俭学学生进步组织一起，发动了向中国驻法公使陈篆要求生存权、学习权，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国反动政府同法国当局暗中勾结，出动法国警察，进行镇压，把一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武装押送出境。后来，仍留在法国的一部分勤工俭学青年，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的领导下，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又名“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出版油印刊物《少年》、《赤光》。一九二二年，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直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周恩来等共产党员，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总之，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大批中国青年在国外环境

里,了解外国状况和国际革命斗争形势,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为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干部。周恩来、蔡和森、徐特立、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李富春、蔡畅、欧阳钦、李维汉、李大章、何长工、许德珩、贺果等同志,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参加者。

毛泽东同志决定自己不出国,留在国内从中国现实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深入的研究、调查,中国处在伟大的变动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二五 接触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八年九月间,毛泽东同志到了北京,过着穷苦的公寓生活。杨昌济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作教授,毛泽东同志和第一师范的几个旧同学,仍经常去请教。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同志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小职员,登记来馆看书报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务,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计较地位与金钱,能够糊口就得了;在图书馆里能得到自己读书的机会,他很高兴。

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大钊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优秀的进步的学者,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介绍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在北方的领导者。他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搜集了许多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他自己除讲学外,就住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学们常到图书馆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导,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给学生看,并且告诉他们阅读的方法。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更是便于经常请教。他的抱负、理想和才能,得到李大钊同志的尊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

出的领袖。这年十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上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一面在图书馆工作，一面继续自修。他还是又学又问，除读书外，常去拜访当时的一些名流学者。北京大学那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导的作用，大学里的学术团体也多。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余暇时常到北大去旁听，并且加入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在北京，毛泽东同志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见闻，这时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兴趣更加增高了。

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等在中国也颇为盛行，毛泽东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学习，得以特别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六 开展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同志由北京经天津、山东、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钱买票，来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别了一批放洋去法国的同学、青年之后，毛泽东同志决定回湖南去。他经常惦念着这块土地，他是在这里生长的，是在这里求学和开始社会活动的。这里还有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会务需要发展。他要回到故乡去，结合同志，继续研究学问；团结人民，和压迫者作斗争。

四月初，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除继续

组织、团结青年外，并和一般对张敬尧统治表示不满的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广泛联系。

新民学会的组织现在发展到了长沙以及湖南各地许多学校，会员有学生，有个别中小学教员。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核心力量。

为了维持生活，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小学每周教几个钟头的历史课。但月薪不到十元。

这时候，一个狂风暴雨似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了。

这是一个爱国的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反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宣传科学的、民主的新文化。

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运动，但这个民主主义“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①。它在这时候进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②。这个民主主义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这个运动的爆发点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大示威游行。

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在和会上取消日本在战时强迫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但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六二八页。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载《毛泽东选集》，第五二二页。

不在和会讨论；反而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到中国，人民愤激的不得了。段祺瑞政府和其亲日派大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不反抗，实际是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行事。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①。“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②

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北京专门以上学校的两万五千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五月七日那天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个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三十二个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五月六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这一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都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全国人民都奔向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流，大家要求组织，要求行动。

湖南人心非常激昂，张敬尧压迫无效。毛泽东同志自己写了一个字数不多、热情奋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传单，第一句是：“同胞们，起来！”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新民学会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载《毛泽东选集》，第五二三页。

② 同上书，第五二二页。

的会员们积极活动。六月三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了。当天发出争回青岛的宣言：“请斩曹陆，以谢天下。”长沙学生于这一天全体罢课。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响应。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彭璜^①、柳直荀^②等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朋友，同志。泽东同志自己实际参加领导学联的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

学联这时主要的活动是：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

按照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办法和经验，七月中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它的基层组织为救国十人团，在一个多月之内这种十人团在长沙就达到四百多个）。

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动，作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

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

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

全湖南省、全中国在这时候都动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在师范学校求学时的许多活动已经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了，现在更敏锐地和大踏步地立即卷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浪涛里去，并站在浪头——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七 革命的新闻、政论工作—— 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

毛泽东同志在他著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

① 彭璜，号殷柏，五四运动时湖南的学生领袖，一九二二年死。

② 柳直荀同志，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经过南昌起义，作过各种秘密工作。一九三三年，在湖北洪湖革命战争中牺牲。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①

这一段话，精辟透澈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它的意义、价值和作用。

五四运动发展到六月三日以后，更加高涨了，更加扩大、深入了。

六月三日北京的学生们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一千多人。

六月五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

天津、南京、杭州、九江、武汉、厦门、山东、安徽等地学生、工人、商人也起来响应。

唐山、长辛店的工人示威游行。

六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要求惩办卖国贼。

北京政府不得已于六月九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答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九至六六〇页。

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果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因此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①。

作为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起了推动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即“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②的运动，普及于全国的各个角落。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版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各抒所见。李大钊的政治学术论文，除上述两篇外，一九一九年五月又发表了《我之马克思主义观》。鲁迅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狂人日记》，一九一九年三月发表《孔乙己》，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那时刊物中较有份量的，有《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当时称为进步的言论机关。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同志认为，在长沙有出一个刊物的必要。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泽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六六〇页。

② 同上。

东同志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意思新颖，热情奔放。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同志曾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就用“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题目，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他写的三篇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他那时写道：

他：“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同志凭他的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特别是因为被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及当时匈、奥、捷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鼓舞，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除政论外，有西方和东方大事述评的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和湘江的杂评，有“新文艺”、“放言”等栏——一种随感录和小品文的形式。刊物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礼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劳动，提倡民众联合（团结、组织起来）。

《湘江评论》这刊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销完，又重印两千份。它大大地推动了和加强了湖南全省——不仅湖南省——的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湖南的——不仅湖南的——知识界、教育文化界，使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

封建旧礼教等等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在它的篇幅上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七月二十一日和《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二十八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这时候湖南各学校的学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钟》，毛泽东同志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站在领导地位的《湘江评论》发起组织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从此宣传的步调更加整齐了，宣传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张敬尧查封了。第五期已经印出，也被没收销毁了。他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同志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

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同志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

“平民通信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和陈赞周等同志办“平民通信社”，自己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时，一面团结湘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一九二〇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五月下旬吴带着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湘南的谭延闿、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了，于六月十一日从长沙仓卒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

这是湖南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行动。

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个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和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个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在北京、上海组织

“平民通信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和陈赞周等同志办“平民通信社”，自己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时，一面团结湘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一九二〇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五月下旬吴带着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湘南的谭延闿、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了，于六月十一日从长沙仓卒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

这是湖南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行动。

第六章 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

二九 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为 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

苏俄政府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那里面声明，苏俄政府“……宣言废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夺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人民……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它各种产业，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及在中国境内之俄国贸易区。”“如中国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国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国成为第二朝鲜或印度之……命运，则愿其了解，足以作为其在为国家自由而奋斗中之联盟与兄弟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而莫属”^①。

这个宣言最初被反动派严密地封锁，但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的耳目，大受国人的欢迎。人们对十月革命，对新的俄国，同时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正确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

^① 《苏俄致中国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七十多年之久,来到了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福音。

当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北京时,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当时由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阶级斗争》,以及一本《社会主义史》几种书。这些读物的数量虽然很少,却给一贯好学、善于精读、勇于追求和承认真理的毛泽东同志以很大很深的影响。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同志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毛泽东同志这时非常热衷于留俄,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以长沙为基地。

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作驱张的工作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密切地联系。这个学会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在上海设总会,在北京、湖南、广东……等地设分会。《新青年》杂志改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

在上海,毛泽东同志又特别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开展民主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问题。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在行动上已经成为了

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同志回到了长沙。

就在这年冬天，毛泽东同志与杨开慧同志结成了革命的伴侣。他们认识已有多年了。早在毛泽东同志刚入第一师范学习时，杨开慧同志即已随父亲怀中先生迁来长沙居住。几年学习期间，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陈昌等同志一起经常到“板仓杨寓”请教和讨论各种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抱负和卓识深深激励着杨开慧同志。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与随父居住北京的杨开慧同志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他和邓中夏等同志经常到杨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勤工俭学等工作。杨开慧同志有机会参加了这些活动。这时，北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使十九岁的杨开慧同志受到革命的战斗洗礼。第二年春，怀中先生病逝。杨开慧同志再回长沙求学，带头剪短发，进男校，热情宣传反帝爱国主张，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参加斗争。当时，毛泽东同志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杨开慧同志在该会担任了宣传工作。革命活动经费短缺，杨开慧同志不顾家庭困难，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北京大学同事送的祭葬费捐献一部分出来。他们的友谊和爱情，正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的基础上。杨开慧同志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我党最早的优秀女党员之一。她跟随毛泽东同志从事各项革命活动，是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忠实学生和亲密战友^①。

^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杨开慧同志跟随毛泽东同志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和武汉等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展党团组织，整理文稿，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党的机要、交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同志遵照党的指示留在长沙东乡板仓，开展党的地下武装斗争，直至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四日英勇就义。

三〇 宣传！组织！斗争！

在这时期，毛泽东同志在长沙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更加扩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为了有一个立脚点，要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同志受聘作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同时他兼作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师范毕业就教师范）被聘请作了第一师范一个班的级任兼国语教员。

从一九二〇年夏天起，毛泽东同志在长沙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政治的活动。

首先是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接着就作湖南自治运动——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从此再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和蹂躏了，而由湖南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谭延闿、赵恒惕利用这种民情，投机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但这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政策。因此在《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里便警告人们说，湘局虽侥幸解决了，但将来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当用自决的精神来创造一切环境……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讨食……”。

为了一面组织和扩大人民的民主运动与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统治者欺骗政策的本质，毛泽东同志约集了一些朋友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会主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希望谭、赵“亦自认为平民之一，往后举措，

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①。

毛泽东同志曾归纳这个运动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同时毛泽东同志继续他的新闻政论工作。他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这些论文引导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张由人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宪法”。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泽东同志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动总是和群众紧密联系的。这时期他除发表论文外，发动、组织湖南各界各人民团体集会讨论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问题。十月十日又举行了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建设新湖南”的口号；扯下过时的、军阀官僚的代表机关旧省议会的旗帜……

不久之后，赵恒惕推倒了谭延闿，取得了湖南政权。他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制定什么“省宪”。

毛泽东同志还在“省宪法草案”发表时，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它。他着重指出，这个“草案”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关于劳动的事项，如工人的工作时间、工钱、休假、教育、卫生等等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他一面批评这个“省宪”，这种“自治”，一面又发动广大群众，利用统治阶级这个虚伪的、为自己谋利益的假幌子，作有益于劳苦人民大众的事，拿它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这正如古语说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②，使得统治者无话可说。不

① 见《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

② 《韩非子》里面的话。

然,就把他虚伪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泽东同志刚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的一项有很大意义的活动,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文化书社”,在全省大量推销各种新的书报。他吸引一些名流参加这种事业。这个书社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共产主义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书社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经常开会讨论,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们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等等。

一九二〇年秋,继上海、北京之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去了(其中有任弼时同志^①、肖劲光同志等)。

十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

^① 任弼时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自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党的历次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三年任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红军第六军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后,任二、六两军团组成的第二方面军的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民学会的会员加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与领导下，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活动，成为了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设共产党作了各种准备。整个五四运动建立了伟大的功劳——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①

这里需要补充叙述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作那些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作了一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现在还有人记得，他曾经从毛泽东同志那里领到许多小册子，拿到街上去卖，价钱非常便宜。那些小册子的名称有：《伙友们》，《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兵士的生活》等等。小册子的文字很通俗，内容是宣传社会主义，谈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找出路只有团结起来革命。

三一 他同时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

毛泽东同志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在这个时期，他一面从事于各种各样的革命的组织的的工作，一面又从事于教育工作，而他的教育工作又是杰出的，他在这一事业中的见解与实践也是很卓越的。

当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同志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时，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六六〇页。

即一反过去学校行政的专制黑暗，而竭力提倡民主作风。他聘请教职员，以才德为标准。学生所普遍反对的人就让其辞退。小学生也组织自治会。学校经济绝对公开。小学生活泼愉快极了。高级小学三年级的国语就不用当时的官方的教本，而选印时文作教材。湖南省当权者闹什么“省自治”，泽东同志自己作了一篇文章，揭发统治者的虚伪，作为国语的讲义，印发给学生读。在附小的大礼堂里有一首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是毛泽东同志写的，由学生们刻在竹子上。学生们的家长来了，毛泽东同志总抽出时间和他们长谈，问他们的家境、县里乡里的状况。泽东同志被聘为第一师范级任教员之后，他推荐了有许多年小学教育经验的何叔衡同志接任附小主事。

毛泽东同志破例地被聘为第一师范二十二班级任，兼国语教员。这里他的教育方针是民主的、科学的、切合实际的；教授方法是启发的、循循善诱的。在校务会议上，他主张：一、学校经济公开；二、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校务会议；三、不开除学生。由于新的思想潮流在学校里占优势，由于泽东同志的影响，当时学校行政方面比较开明，大多数教职员也比较进步，因此他这三项主张获得通过。他自己选印（学校内部有铅印设备）国文活页讲义，教材的内容着重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外兼用。讲义印出后，由他校正，在教务处墙壁上张贴出来，学生们对正自阅。上课时，他又按讲义逐段逐句讲解，并说明作者及其文学派别、作者的思想 and 背景、问题的由来等等，随即联系到现实社会问题；次由学生们提出问题，经过讨论，然后由他作总结性的解答。每逢他上课时，学生的座位上都是坐双人，教室挤满了，室外走廊站满了。这些人是其他班次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那时没有课，有的放弃了本班的课来听他的课。别班的同学们自己

备钱,请教务处多印一些毛泽东同志所选用的讲义;没有钱的就向有讲义的同学借阅。他教学生作文时,也不同于向来一般的惯例,他不出题目,让学生们自己出题自己作。而且不拘诗词歌赋、论文、杂文、小说哪样体裁。写时用文言、白话都可以。见有进步思想的作品,无例外地顶批“传观”,后面又写上评语,装在教务处公布栏的玻璃框内。事后收起,退回学生。

泽东同志在学校里常号召学生看报。他说,报纸就是一种“活叶文选”。同时他把报上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大体地叙述分析给学生们听,这样既介绍了报纸内容,也诱导了学生看报。因此,当时第一师范的阅报室渐渐有人满之患。不少听他的讲的学生,由于他的影响而养成经常读报的习惯。

泽东同志教学生们用功钻研的说法是:读书求知,主要靠自己;教员不过是块指路碑,告诉你们向何处去。假使你自己不走的话,就一辈子停在碑跟前。不仅止此,久而久之,教员所指的,你都会忘掉。他又常说:读书求知为自己,又保险,一不怕强盗,二不怕水火,三不怕人分去。

对学习的方法,泽东同志常对学生们说:应懂得“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仅得其零”的道理。这就是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但又要踏踏实实地学。要脚踏实地往上跑,不要以一知半解而自满。

在第一师范作教育工作的当中,毛泽东同志没有一时忘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努力。他一面教课,一面帮助学生开展社会政治活动。当时还在学校求学的郭亮、夏曦、萧述凡^①等同志组织有马克思学社,实际是学生自治组织的领导核心,泽东同

^① 萧述凡同志,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团省委书记,一九二六年病故。

志领导这个学社的工作。他通过进步学生的组织，对个别教员和少数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斗争。在自己班上教课时，在学校内许许多多的团体请他去讲演时，他也批判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他的讲演大都是关于学术、社会等问题。他介绍、分析、综合，有条有理、实际、生动、没有空话，大受听众欢迎。

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在第一师范（以及长沙其它几个重要学校）里，比起其它各种“主义”、“学说”来，始终是占绝对优势的。

为了争取、教育长沙各中学校内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学生们，毛泽东同志利用他们已有的每周一次聚会漫谈的形式，组织青年同乐会——每逢星期日邀集这些青年和其他同志们，或步游岳麓山和长沙郊外，或去湘江划船，谈时事，谈主义，吟诗作词。据曾参加过的人的回忆：一个中秋的晚上，他们坐上划子去湘江中流赏月，绕着水陆洲（又名橘洲）游览，深夜才回家去……在这样一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当中，毛泽东同志对青年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渐渐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些工作都曾为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了准备。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最初阶段上对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其一定的——桥梁与先锋的——作用。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需要作青年学生运动、文化界知识界的运动。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于是用最大的精力来作工人运动。

三二 找到了更好和工人接近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懂得：只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基本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毛泽东同志除组织、领导一般的、社会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运动。

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结合的过程在当初是颇不容易的。在开始的时候，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两方面都觉得格格不入。这时候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放下臭架子，怀着满腔热忱，并甘心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接近群众，渐渐也当群众的先生。

毛泽东同志下决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去。农家出身的他，素来就具有一项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领——他能找到和工人群众接近的大众的语言。他的诚诚恳恳的心，老老实实的态度，简单、透澈的语言，能够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难的事物，最深奥的道理，泽东同志能给工人们解释得清清楚楚，使他们理解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去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块喝茶，交朋友。

一天，毛泽东同志去长沙城的南门外和小吴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走来走去，总希望遇见个把工人。后来终于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

经过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泽东同志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

回来后，泽东同志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员。

突破了一点之后，泽东同志运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丛中去。

泽东同志来到铜元局——湖南造币厂，找工人谈他们的生活、工资……工人觉得客人很关心他们。

泽东同志走进成衣店，和裁缝们慢慢谈他们的工作、衣料、收入……

客人坐人力车来到毛泽东同志家里，他请车夫进来喝茶，和他谈话。后来派罗学瓚同志专作人力车夫的工作，常和车夫漫谈，长谈。为人力车夫办成夜校时，泽东同志曾亲自给他们讲课。

湖南第一纺织厂成立了，开工了。无政府党人在纱厂里颇有影响。毛泽东同志找到了纱厂工人，谈了许多。

黑铅炼厂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铅印工人，面粉厂工人……都来找毛泽东同志，谈他们的生活，说出他们的要求。

泽东同志曾乘坐长株、株萍铁路的火车，去到安源，深入矿井。由长沙几个路矿工人的介绍，认识了许多矿工。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回到长沙后，又派李立三同志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后来安源工人的斗争在其他同志领导下更大发展起来。

“交几个工人作朋友，可以认识、团结千百个工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主意和宝贵的经验之谈。

和工人们接近了，给他们办夜校，办补习班、识字班，教育他

们，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启发他们的觉悟，然后讲工人们应该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道理。

在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面，泽东同志都努力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通过他们开展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结了。

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等，就这样开始奠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基础。

三三 “作始也简”（成立中国共产党）

长沙城里除《大公报》、《新湖南报》等大报外，还有一种小型的《湖南通俗日报》，很受读者欢迎。通俗教育馆的馆长兼通俗报的经理是何叔衡同志——宁乡人，前清秀才。他在楚怡小学教过书，往往为了教育或责备小学生，甚至自己哭起来。他有一嘴黑胡子，一对锐利的眼光，满腔热情，一颗赤诚的、力求进步的心。他是“新民学会”唯一年纪较大的会员，但他是非常有精神，最肯出力而能够刻苦的人。毛泽东同志曾笑说：“何胡子是一条牛！”又说：“何胡子是一堆感情。”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以及和毛泽东同志的交游，吸引、推动了“何胡子”（同志们都这样叫他）。通俗报上的文章提出了人民自己的主张，批评了湖南的反动统治者。

何叔衡同志任职后，通俗报馆第一次开会，毛泽东同志被邀请参加了。他对报纸的改进，发表了很多意见。开会完了之后，泽东同志到那时刚从宁乡教小学出来、正在作报纸总编辑的谢觉哉同志的房子里坐坐，谈谈，态度是非常恭敬、谦虚的。

毛泽东同志也曾为通俗报写过通讯。

何叔衡同志办了十个月的通俗报，报纸的销路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二一年夏天赵恒惕下令撤何叔衡的职。

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同志来到通俗报馆，很快地就邀何胡子一同离开了长沙。

他们两人带着很简单的行李由长沙经汉口，挤在长江轮船三等舱里，来到了上海。

中国的工人阶级最初是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办的某些企业中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国际资本压力暂轻的时期，又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这里也更加长成和壮大起来。

五四运动由学生知识界发起，发展到后来的工人罢工与商人罢市。就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的成立，五四运动的推广和深入，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进一步的觉悟和团结，于是以巨人的姿态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也于是应运而生。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各地就有了个别的共产主义者了。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及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中间，都有了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到一九二一年六月末，全国各地有了五十多个共产主义者。七月，各地共产主义者小组的代表来到上海集合开会，组织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即成立大会。

湖南来的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湖北来的董必武同志、陈潭秋同志^①，山东来的王烬美同志，以及原来在上海并受委托发信召开成立大会的李达同志等，共十二人出席了这一次代表大会。远道而来的代表们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子学校里（那时该校已放暑假，校中只有一个校工和一个厨夫在）。大会的开幕式就是在这所学校里秘密举行的。接着就在望志路一〇八号（现为兴业路七十八号）的厢房楼上进行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目前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组织问题。

到了第四天晚上，忽然发现隔壁房子来了侦探，因此第五天代表们就离开了上海，大会改在嘉兴南湖中间的游艇上进行，一天而结束。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救星诞生了。

《易经》上有句话：“作始也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时

① 陈潭秋同志，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一九二〇年他同董必武同志在湖北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成立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湖北区委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曾参加党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驻顺直省委中央代表、中央巡视员、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一九三三年以后进入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工农民主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主席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的名义，领导党在新疆的工作。一九四二年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反苏反共，陈潭秋同志被捕入狱，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被秘密杀害。因敌人封锁了这一消息，故在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的写真。

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他在大会上明了的、朴素的说话，总是很具体、扼要的。他所代表的组织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是当时党内最有基础的组织。

三四 可纪念的“三十节”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回到了湖南。毛泽东同志团结其他同志，继续并大力开展他的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以实现他自少年时代以来就日夜孜孜不忘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

曾经是朴素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发展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因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灌溉和实际斗争的锻炼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成立时又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从此，便肩负着党和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更加自觉与满怀信心地献身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献身于谋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的中间，一时在丛林里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脚步郑重的毛泽东同志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同志。

还是在夏天就开始筹备，到现在“三十节”（一九二一年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十月十日通常称为“双十节”。这年

为“民国”十年，故曾戏称为“三十节”）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就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他慎重地吸收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渐渐地长沙城里，首先是在一些学校里（第一师范、岳云中学、第一中学、甲种工业等）都有了支部。在铁路工人、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电灯公司工人以及各手工业工人中间也发展了党员。后来湖南各县（如平江、衡阳、水口山铅矿、炭塘子锰矿等）也有了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湖南地委（即现在的省委）成立了，泽东同志任书记（地委后来改为湘区委，因为也包括江西省萍乡的安源）。地委的机关设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一栋简陋的房屋里。那是在小吴门外教场坪的后面，那里有一片菜园，有稀稀落落的一些房屋。

这里附带叙述一个细节：那时地委每个月的经费仅只三十元。所有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同志也一样，都得自己维持生活。

三五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各省、各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在法国、德国和在日的中国人中间，也先后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瓚等同志和作者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那里仍然时常集会；和国内的朋友们，和毛泽东同志，也经常通信，讨论社会政治和学术问题。其中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在一九二〇年内的几次通信，就积极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蔡和森同志到了法国之后，努力学法文，看法文书报、小册子，于是将他所了解的当

时世界革命运动的形势，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状况，共产党、共产国际组织的某些原则以及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详细写信回国和毛泽东同志商讨。毛泽东同志在他给蔡和森同志及在法诸友的回信中，对革命的方法问题，奉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要达到共产主义目的用革命手段还是用改良办法等等问题，作了极为透澈的批判。他说，不用革命的手段，要想谋全体的幸福，在事实上做不到。又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我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赞成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式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和留法的蔡和森同志等已经坚决认定对中国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和组织革命的先锋队、作战部——共产党的必要了。

一九二〇年秋，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们团结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其他的人。初组织“工学励进会”，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决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那时候，他们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一面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间作共产主义的宣传、组织等活动，团结了更多的人。

在一九二一年初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同志并且告诉蔡和森同志说，党的事国内已在进行组织。

一九二一年秋，蔡和森、张昆弟、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立三等同志一百余人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逐回国。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①、陈延年^②、王若飞^③、李维汉、陈乔年^④、刘伯坚^⑤、袁子贞^⑥等同志，以原有的“工学世界

社”为一个基础，组织了旅法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并出版了油印的中文刊物《少年》。他们和法国共产党及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发生了联系，个别的且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廖焕星同志是负责人之一，那时在德国考察研究的朱德同志是其中之一员。

这些在海外的共产主义团体的组成，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东西遥相呼应。

就在这时候，作者接到了由湖南去的、在莫斯科学习的任弼

-
- ① 赵世炎同志，四川酉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去苏联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曾任党的北方区宣传部长，江浙区组织部长。领导上海工人三次起义，一九二七年七月在上海被蒋匪逮捕，七月十九日牺牲于上海龙华。
 - ② 陈延年同志，安徽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去苏联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六月在江苏省委接头地点被蒋匪逮捕，七月初牺牲于上海龙华。
 - ③ 王若飞同志，贵州安顺人。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去苏联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曾被派为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一九三一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四月八日在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 ④ 陈乔年同志，安徽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去苏联学习。曾任北方区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被蒋匪逮捕，六月间牺牲于上海龙华。
 - ⑤ 刘伯坚同志，四川南充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去苏联学习。曾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主力红军突围后牺牲于中央苏区。
 - ⑥ 袁子贞同志，河北宛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招去法国作工，后去苏联学习。曾任天津职委书记。一九二七年被蒋匪逮捕后，牺牲于天津监狱中。

时同志等的信，叙述他们留俄学习的状况，大家很是兴奋。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及以后的几年里，这个组织里的同志们大部都去了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然后回国工作。

因此，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一批干部。留法勤工俭学生（他们中的一部分曾去比国和德国）中间出了不少共产主义运动的优秀领导者。

三六 创办最初的“党校”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而学习的方法，他一贯是主张独立思考，自动钻研和共同讨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之后，毛泽东同志立即在长沙着手创办一个自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谁也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从什么地方去找经费、校址、教员、教材等等呢？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湖南，如何能公开地办这样的学校呢？再则，主要的，这种学校的教学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同志于是利用当时湖南某些文人学士所办的“船山学社”的地址和每月四百元的经费，创办了一个“自修大学”。

毛泽东同志素来不满意那时中国一般学校所施行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盲目地模仿欧美日本的、学与用脱节的所谓教育。他也不赞成那种盲目的或只为取得资格，即所谓“镀金式”的“出洋”留学。他而且觉得，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一九二〇年三月他曾从北京写信给长沙的朋友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

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计划在长沙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按:即座谈讨论)两次或三次。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关于教学制度,在上述毛泽东同志办工人夜校及在第一师范作教育工作时,已经尽可能在教学方面行了一些新的改革。关于自由研究,泽东同志现在更实现自己的理想来办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①。

这里还应说明“不收学费”一项的重要性。当时中国的大学,学费都是很贵的。许多有志升学而又有才能的青年,只是“望洋兴叹”,“莫敢问津”。泽东同志办自修大学的方针,除反对机械式的教育、提倡自动的学习,反对为求毕业文凭的虚荣心、提倡实际的学问之外,还有反对贵族学校、提倡平民学制的意义在内。

自修大学成立时,湖南的进步知识分子,党和团的干部,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都作为自修大学的学生。

自修大学内设一个图书馆,凡是当时能够收集到的进步的书刊报纸都找了来,供给学习者阅读。

^①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

自修大学的教学制度，注重自修，没有上课的时间，各人自由研究，或开会讨论。研究和讨论的题目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问题。学生每天作读书笔记，作文一篇。

自从《湘江评论》被封禁后，湖南的知识青年经常怀念它，盼望它能恢复出版。泽东同志现在觉得，自修大学师生研究的成绩，可以出一本理论性的杂志。一九二三年初，一个公开的期刊——《新时代》出世了，里面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同志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讨论的文章。

自修大学曾几次举行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

后来（一九二二年九月）自修大学内附设补习班及初中班，这可说是那时的初级党校。校内指导主任为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夏明翰同志分别担任主事和校务主任）。青年知识分子及青年工人来学的有二百多人。补习班和初中班的功课，大体和一般学校的差不多，但由于当教员的大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因此在教国文、公民、历史等课时很容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成为了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

一九二三年冬赵恒惕封闭了自修大学。但就在那时，湖南党所筹备的另一所中学——“湘江学校”就正式开课了。原来在自修大学补习班和初中班的大批学生都转到了湘江学校。

何叔衡、姜梦周^①、夏明翰^②等同志，原来都是自修大学的教员，现在都来到湘江学校服务。切实负责，不怕艰苦的姜梦周

① 姜梦周同志为人正直、进步，在宁乡很有声望。他是在湖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很早的一个。一九二九年三月被反革命杀害，宁乡各界举行空前盛大的追悼会，除上千的工人农民外，还到有有正义感的教育界人士和士绅们。

② 夏明翰同志后来为中共湘区委员，大革命失败后牺牲。死时写了一首诗很有名。诗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同志名为管理员,实则筹款、招生、请教员、排课程、弄伙食、修房屋等事出力最多。

湘江学校一直存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七年三月由湖南党组织自动停办,师生都参加了大革命。

第七章 大规模地努力作工人运动

三七 斗争是不简单、不容易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湖南的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

一九二一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了几千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大会，提出“改善待遇”、“加强团结”等口号。这可说是湖南工人阶级检阅自己力量的第一次。

现在，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用全力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湖南各行各业工人的工会。

为了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是“书记部”在湖南的负责人。

那时候湖南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组织状况是怎样的呢？

湖南本省造币厂、黑铅炼厂、纱厂、电灯公司、锑矿（锡矿山）、铅锌矿（水口山）、锰矿（湘潭）、粤汉路、长株路的现代产业工人有二三万；加上安源（属江西省，但与湖南邻近，关系密切）矿工及株萍路工又有约二万人。但是这些工人起初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组织。手工业工人（泥工、木工、缝纫、织造、理发……）很多，他们有一种行会的组织，带封建色彩。

这两类工人共同的痛苦是：他们受着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

建主义和资本家及其走狗的几层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作的时间都很长，产业工人每天也要作十二到十四小时的工；工资少，生活都很苦，许多工人都过着非人的生活。

毛泽东同志自己带头，同时派遣了党的一些重要干部，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他们踏踏实实，诚诚恳恳，一步一步地对工人作教育宣传的启蒙工作，唤醒工人的觉悟；同时进行普遍的组织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行动，斗争。

为了组织、发动这些工人，毛泽东同志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在复杂的环境里进行各种斗争，需要运用正确而灵活的策略。

那时候阶级敌人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湖南的统治者赵恒惕和他手下的一帮官僚、政客，都是很反动、很凶恶，而又很狡猾的。他的所谓“省宪法”里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福利、组织工会权利等等就根本没有规定。

几个新式产业的管理方面，除帝国主义者外，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家。他们都把工人看成是牛马奴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非常残暴。

手工业的各行业主和行会的头目都是和官厅勾结的。各行业的组织都是封建性质的帮会（泥木工人有鲁班庙，成衣工人有轩辕殿……）。行会的总管们只向工人收会费、拜菩萨、订行规——主要是拒绝乡村工人到城市来谋生活，此外不替工人做什么事。

复杂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如“湖南工业总会”啦，“中华工会”啦，“湖南总工会”啦，都是些官僚、老板、政客们的组织，打起“工”字招牌，但并不是替工人谋利益的团体。

最后，最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在湖南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必须加以克服。“湖南劳工会”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成立

的，为首的是两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黄爱、庞人铨。这两人对工人的痛苦表同情，他们“以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为目的，组织这个“劳工会”。加入劳工会的人是他们的一些同学和工厂的技师，也有一部分工人。劳工会也举行过群众大会，但到会的学生多，工人很少。他们后来在某些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中成立小组，会员有了数百人。最多的时候有过几千人。

无政府主义的空想——不要政府、法律，绝对自由平等——颇投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兴趣。黄、庞在工人中间有相当高的威信。劳工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某些好的工人也入了会。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知道，封建性的行会、小资产阶级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劳工会都不是工人阶级求得彻底解放的组织。要使工人运动走上正轨，使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有胜利的保障，需要组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的无产阶级自己的工会。毛泽东同志于是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对各种各色的工人组织——行会和劳工会派又讲团结，又作斗争。他耐心地向工人们解释、说服，争取那些组织里面的群众。有时用行会的壳子，但改变它的内容。那些官方的或半官方的合法团体，因为沾了一个“工”字，或也唱唱当时时髦的“劳工神圣”的调子，真正的工人运动有时也利用它们——在罢工时由他们出面声援或作调停工作。

特别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劳工会，虽然它内中的某些人作出分裂工人运动的事，例如他们经常骂马克思主义者是“长尾巴的”——还是要政府，既有政府就和军阀差不多……有些坏分子更造谣诬蔑说“共产党争着作工人运动，为的是骗取苏俄的卢布”……虽然他们百般胡说，但毛泽东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

的长远的利益，还是和他们讲统一战线，团结他们以反抗统治阶级；同时耐心地争取他们会里的真正工人群众，用各种事实和理论说服黄、庞，使他们放弃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斗争终于得到了大的胜利。劳工会中的最优秀的工人任树德等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黄、庞在被害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说黄并加入了共产党）。

十月革命第四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领导各人民团体在长沙举行了一个纪念大会。在大会场上升起一面红旗。警察来干涉，把它扯下，群众又把它升起，又扯下，又升起……群众游行时散发了几千张传单，要求“省宪”中所允诺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等自由。警察来干涉，就发一张给他看。但在游行的时候，武装的警察又向示威群众攻击。经过剧烈的斗争之后，游行的队伍散了。但是这一次的游行，在唤醒人民群众起来的政治意义上有它的很大的作用。

三八 工人阶级抬起头来了

一九二二年是全国工人运动高涨的一年，湖南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一年之初，湖南的工人运动遭受了一个重大的挫折和损失。全赖毛泽东同志的勇敢的与正确的领导，才使得湖南的工运仍然大大地发展；并且和邻省江西、湖北的工运也联系起来。

一九二二年一月湖南华实纱厂的工人二千人罢工，要求发年底奖金。赵恒惕派兵来镇压，开枪打伤几十个工人。工人仍然坚持罢工，并提出“抚恤受伤工人，改良待遇，撤除门岗”等要

求。结果，十二月份发双薪；工人经厂方允许者可以自由出入工厂。

但是一月十六日的深夜赵恒惕派兵捕去这次罢工的主持者黄爱、庞人铨，没有审判，第二天就把他们砍头杀了。劳工会也被封了。

由于黄、庞在工人中间有过相当的威信，自经毛泽东同志教育后，他们更加积极工作，此次又是因主持纱厂工人罢工而遭牺牲，因此引起工人们极大的悲愤。这一天长沙许多工人自动地停止了工作，来到劳工会门前痛哭。下午工人们挤在街上，自发地冲进几个官府衙门，表示抗议。毛泽东同志对黄、庞被害很是愤激。他立即召集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并稳定工人们的情绪。赵恒惕和资本家们以为屠杀政策可以吓退工人运动。但毛泽东同志和他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仍然坚持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下进行极其艰苦的活动。他们极力声援劳工会派的人，对黄、庞被杀，表示激烈的反抗。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在“船山学社”开了两次工人群众追悼黄、庞的大会，并发行纪念特刊。但还有一些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干的一些急躁的行动，却经婉言磋商而停止了。

赵恒惕刚刚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装模作样地公布了他的“省宪法”，现在，只过了半个月就非法杀人，一下子就露出了他本来的狰狞相。

湖南人民愤激得很。但在长沙无法说话，因为赵恒惕箝制舆论，封锁所有的报纸，不许登载这类的消息。

毛泽东同志到上海去，展开声援湖南工人运动和反赵的宣传，在上海、北京各地报纸上发表黄、庞被杀，赵恒惕受华实公司老板们五万银元的贿赂，执行屠杀政策等等事实。这样，赵恒惕

的所谓“省宪”、“自治”的假面具在全国范围内被揭穿了，黄、庞为中国工人阶级英勇牺牲的光荣事迹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称道和同情，而赵恒惕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假面子和名誉完全丢了。赵恒惕心虚，很是苦恼，但无可奈何（有人说，这大概也是他后来对湖南的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不敢立即采取屠杀政策的一个原因吧）。

泽东同志很快就回长沙来了。现在他领导湖南的党更加积极地推动工会运动。

一九二二年的五月一日，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这一天，长沙城上万个工人在南门外第一师范学校门前马路上和门内院子里集合，开大会，提出“要求恢复工人组织，实行三八制（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增加工钱——都用银币计算，替死者复仇，工商学联合起来”等口号。

一九二二年在全国有许多大的罢工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长江海员罢工，上海邮差罢工，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广州盐业工人陆续罢工。

“五一”节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同年七、八月有全国工人的“劳动立法运动”。

一九二二年，特别是一九二二年的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湖南的工人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罢工的潮流很是高涨。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都罢工过，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店铺同盟罢工。这一连串的罢工大都得到了胜利。

现在长沙的产业工人和各行手工业工人，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的工人们都组织起来了，许多工会都成立了。仅长沙城就有二十一个工会，毛泽东同志一人亲自兼作八个工会的秘书。从这些事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忠诚、踏实、积极负责为工人阶级

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的。他真是“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工人)的好朋友”^①。也看得出，工人们是怎样信服和拥护泽东同志的。这时候全省有组织的工人将近五万人了。

在各个罢工斗争中，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在各个工会里发展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建立了党与团的支部。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领导、踏实的工作和他所领导的湖南共产党员干部们的艰苦奋斗，现在得到了第一个果实：湖南人民的革命领袖——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巩固、发展起来了。

三九 “我就是工人代表”

长沙城里有约五千个泥、木工人，是手工业者，大部是建筑工人。他们住的很散，但作修建工作时又颇集中。上面说过，泥木工人的旧式的组织——鲁班庙是封建性的。把头们专会向工人剥削：新学徒要交“红名香钱”，即入行费；出师时要做“出师酒”……名堂很多。这显然不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组织。

由于那时湖南币制的混乱(除一般的银元、铜元外，有各种纸币：本省官钱局出的“官票”或名“鸟票”——因上面印着鸟儿；有各大商店自己发行的“市票”……)，兑换的时候常常相差很大。物价却是照银币计算。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只发“官票”或“市票”；大商店有时倒闭，市票就成了废纸。因此工人的生活一天天困难。工人们要求加价，并一律照银币计算。但长沙县知

^① 《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长沙《大公报》。估计是当时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毛泽东同志的手笔。

事不准，并贴出告示，说工人“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

泥木工人非常气愤，一个夜晚撕毁了县知事在全城贴出的告示。行会的把头们要工人捐钱，请官方的人吃酒席，说是替工人办“交涉”。工人们早就不相信把头们的那一套了。但是怎么办呢？

毛泽东同志耐心地在泥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首先是和工人交朋友。

木匠任树德为人诚实，在同业中有威信。他常到船山学社作零活，毛泽东同志和他谈话，给他灌输革命的思想。他原是劳工会的会员，现在领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心里觉得，这才是解放工人阶级最好的道理。

任树德和泥木工人袁福清、朱有富等都住在北门外。早起去上工时，任总叫袁和朱一声；晚上下工回来也和袁、朱等闲谈。任树德说，要组织泥木工会……袁等也觉得对。

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工人中毁谤马克思主义，有些工人起初盲目地相信他们的话。

一天朱有富对袁福清说：“任树德是马克思主义……。”

袁：“那我们不和他一起干。”

朱：“马克思主义也不坏。你想，照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没有政府，没有组织，大家都要‘各取所需’，如何办得好？”

袁听了没有作声，心里想，马克思主义也是有道理的。

任树德又引了袁、朱和其他泥木工人——也是劳工会的积极分子——到船山学社来，和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接近。这些人看见泽东同志等非常诚恳、谦虚，处处为工人利益打算，的确是工人的好朋友，于是渐渐消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许多工人都慢慢地觉悟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决定为泥木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他通过任树德、仇寿松、张汉藩、杨福涛、朱有富、袁福清、舒玉林……等积极分子去教育和组织广大的泥木工人。组织的方法是先以十人团作基层组织。两三个月之后，就组织了一百多个团，一千多人。

一九二二年九月五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成立了。工会的十八条章程就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

工会成立之后就发动改订工价的斗争。首先毛泽东同志找任树德等来省委开会，仔细研究了情况，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十月六日长沙四千多泥木工人罢工。

毛泽东同志从头到尾，亲自领导这次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他分析了当时湖南的政治环境，决定斗争的策略；运用了合法的斗争——采取了群众请愿的方式，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来讲道理。他随时鼓舞工人的决心。工人内部组织严密，团结坚强。毛泽东同志同时扩大宣传，造成舆论，壮大工人的声势，取得社会的同情。除全国各地及湖南其它工人组织外，并争取上层公法团体的支援。因此，四千多人坚持二十多天的斗争，得到了巨大的胜利。

据当时参加这一斗争并充当工人代表的袁福清同志等的回忆，有如下的详情：

罢工以后，有二三百泥木工人来到鲁班庙集合。这时封建把头的狗腿还在要工人再捐钱出来，以便去省府交涉加工钱的事。工人们喊一声“打！”那个人跑了。几个积极分子便上台讲话，主张罢工，请愿。全体工人举起拳头来，表示赞成。马上印油印信通知工友。新庙由任树德等负责，老庙由袁福清、朱有富负责，向全体泥木工人进行动员工作。

开了几次小会、大会。工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已经出

了五角，又要出钱？老子就不出！”有的说：“罢工多少天了，还无着落，罢到哪天为止呀？”接近那些要大家去向政府交涉的一个工人说：“如果罢工，那么向政府交涉就难得有效……”又有人说：“还是全体去请愿要求的好。”一个接近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人说：“到军阀面前去请愿？犯不着！”大多数的工人却说：“管他请愿不请愿，到长沙县打那个狗入的一顿，出一口气也是好的……。”

结果，大家同意请愿，并且举出十六个代表，内中有任树德、袁福清等。袁等觉得，自己当了代表，但不会说话，怎么办呢？于是又来找任树德，要他去请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帮忙。任树德满口应承，立即邀代表们去“船山学社”开会。不知怎么的，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也跟着来了，会没有开成。改到清水塘毛泽东同志住处开会。共产党湖南省委就在这里的几间房子里。省委开会及和城内外支部来人接头，多半在晚上。当晚泥木工人代表见了毛泽东同志。他亲切、关心、仔细地和大家商量好，决定第二天召集工人大会。代表们辞别毛泽东同志出来，一个个更加有了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第二天，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四千来个泥木工人来到教育会坪集合开大会。略略讨论后，将请愿的问题付表决。几千只拳头举起来了，有的把袖口勒得很高。同时通过十六个代表的名单。

上午九点钟，几千个泥木工人的队伍由教育会坪出发。队伍前头一块横的旗子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队伍的前后有工人自己组织的纠察队，一百来人，维持秩序。

队伍到了长沙县，为首的几个代表进去见县知事。县知事

不得不接见。彼此辩论了一番。县知事辩不过工人代表们，因为他们和他算账，说：“我们每天得这点子工钱，真是不能活命，你县知事是父母官，一定要请你作主……”这对县知事也是一种讽刺。县知事没有话可说了。这时他旁边一个军人模样、腰挂东洋刀的说：“县长请进去休息休息，不要理会这些人，他们胡闹，押起来！”代表们齐声说：“好！你打算把我们押在哪里？我们自己进去。”同时嘴里骂：“军阀！走狗！”这时立在外面的工人大队不断地在喊口号。代表们和县知事等在衙门的第三进房屋里谈判，都听得见外面的喊声。县知事和那军官听了，心里也有点害怕。但谈判无结果。代表们出来对群众宣布说：“不答应。”群众愤怒，都要冲进衙门里去，不答应就不出衙门。队伍向衙门内冲。卫队用刺刀对准工人，工人缴了卫队一枝枪。这时衙里出来一人，假意责备兵士不该拿刺刀对人，并且打了他一个耳光。工人见他这样就说，不难为当兵的，于是把枪还给他了。可是衙门里的这个人这时将“大令”一举，口说：“你们造反么！？为什么这样野蛮？如果要动野蛮，看这是什么！”（意思是：如果动蛮就要开枪。衙里这时约有一连军队。）代表们叫工人们全体立即蹲下，说：“我们只是为了要一碗饭吃，赤手空拳，不是什么造反。你们有卫兵，举‘大令’，要杀人，看是谁动野蛮？”“你们用刺刀对付我们，为什么讲宪法的政府这样野蛮？”

两下争执不止，结果说是静候解决。县府又请来一连兵把请愿的包围住，只准出，不准进；也不准吃饭或喝开水。工人的纠察队又在外层把兵队包围住，只准进，不准出；就不吃饭、不喝水。形势是非常紧张的。这样相持到晚上，代表们仍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工人们表示一致随从代表们的意见，决不中途妥协或自由行动。

毛泽东同志这次穿着旧的对襟衣服，亲自参加了工人的游行示威和请愿运动。他插在队伍里，随时就地指导工人的行动。现在到了黄昏时候，他悄悄地和工人代表们谈了一会话，主张坚持下去。叫工人群众喊口号。他带了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了。事后有个报纸上说：“工人们口号一喊，县衙门的屋瓦都起飞。”衙门里的人注意到了这个吹哨的领头人，要去抓他。但他从坪里靠墙的几棵大树底下穿过去，回到工人丛中来了。

这样一直坚持到三更过后，快到四更天了。衙门里派人出来说，省政府吴政务厅长打了电话来，要工人们暂时回去，今天大家也累了，明天开公团会议，一定有结果，请工人派代表去谈判。工人们的确也很疲倦了——早起后一天没有吃饭，只吃了些饼子……缝纫工会的人打着工会的灯笼送了开水点心来，还有送油布草纸的，准备泥木工人露宿用。请愿的工人们非常感动。代表们商量了一番，叫群众暂时回家去休息。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扮作工人模样，亲自作首席代表，领导任树德、张汉藩、仇寿松^①、杨福涛、朱有富、袁福清等十多人一同去政务厅谈判。到了政务厅门口，问了一下卫兵。卫兵们很凶的，只吼了一声：“上楼去！”当时有人心里想：昨天没有出事，今天大概要逮捕的吧？到了楼上，只见一张番菜长桌，上面还有点心、茶等等。那姓周的长沙县知事坐在一头，也不作声，恭恭敬敬的，两手摆在膝盖上。一会，政务厅长吴景鸿，卫戍司令周某

^① 仇寿松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五年被派到锡矿山领导工人运动，任工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任党的长沙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被捕，四月二日牺牲。

进来，县知事站起。厅长坐下，县知事才也坐下。

谈判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代表工人们说话，热烈地拥护工人的利益。他手里拿着“省宪法”，根据上面的条文和对方辩论。他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对方无话可说，于是问他：“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贵干？”卫戍司令也粗声地指着他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毛泽东同志说：“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对方又无话可说了。当时和他一道去谈判的工人代表们对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又敬爱，又佩服。

谈判经过许多时候，中间又经过一些斗争，对方只得答应工人的要求——营业自由，工价现在为三角四分，将来也由工人和雇主双方自由协定，政府不加干涉。

斗争胜利了。这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空前的大胜利。长沙全体工人都很兴奋。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到了全体泥木工人，以及第一纱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理发、笔业、缝纫、漆业、印刷业……等等有组织的两万工人群众，并照了像留作纪念。然后全体游行，喊口号：“劳工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这一胜利鼓舞了全长沙和全湖南的工人。以后湖南的工人运动更加开展了，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更加增高了。差不多所有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现在都转变过来了。那个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狂的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间的影响，现在可说是完全肃清了。

在这个胜利的影响之下，长沙各行业工会先后组织起来了。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如理发工人、织造工人）也都取得了胜利。

任树德^①是长沙工人中最早加入共产党的同志。罢工胜利后,张汉藩^②、杨福涛^③、朱有富^④等同志加入了共产党,袁福清、舒玉林^⑤等同志加入了青年团。后来其他许多泥木工人先后都加入了党或团。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前,长沙泥木工人中的党团员曾经达到三百多人,其中一些优秀的同志后来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物和党的重要干部。

四〇 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支雄厚力量—— 安源工人俱乐部

安源属江西省的萍乡县,离湖南很近,又因有株萍铁路,和湖南有密切的联系。在矿山和铁路上工作的工人也以湖南人为最多。所以安源地方的工作始终是归湖南党领导的。

安源矿业是在当时就已有了约三十年历史的新式大企业,有工人一万二千人,每天出煤二千多吨,焦煤约七八百吨,是张之洞、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有名的钢铁企业,把大冶的铁,用安源的煤,运到汉阳去炼。因为曾先后向德国和日本借款,所以公司的实权落在帝国主义者

-
- ① 任树德同志,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因病逝世。
- ② 张汉藩同志,湖南长沙人,裁缝工人。曾任缝纫工会委员长,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任中共长沙市委工人部部长。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党叛变革命后被捕,不久牺牲于武昌。
- ③ 杨福涛同志,湖南人。曾任长沙泥、木联合工会委员长,中共省委委员、衡阳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被派去和湖南红军联络时,被蒋匪逮捕,牺牲。
- ④ 朱有富同志,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曾在檀木岭集合农民七百余,配合浏阳农民武装进攻长沙。之后调任党的长沙县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因叛徒告密,在长沙被捕,即被杀害。
- ⑤ 舒玉林同志,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五年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年冬回长沙工作。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牺牲。

的手里。

安源路矿工会是由党的湘区委员会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去进行工作，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中一支非常雄厚的力量。但这一个基础的最初的奠立者是毛泽东同志，往后的工作，泽东同志也时常直接指导。

毛泽东同志在长沙作工人运动时，就注意到安源矿工这一大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长沙城里的工运刚略有布置后，他便邀了那时还正待教育、争取的黄爱、庞人铨和其他三个人共六人亲自到安源去。经过长沙的及株萍铁路的工人的介绍，他身穿旧的蓝布衣裤，背着雨伞，来到安源“参观”。他亲自深入矿井，又看了窿内窿外(厂)和铁路。在这里他住了一个星期，结识了许多矿工朋友。开始他也是提议给他们办工人夜校，以便宣传并组织起来。矿工们觉得这个参观的客人诚诚恳恳，处处为工人打算，是个够朋友的，便同意办工人补习学校。毛泽东同志大喜，回到长沙后，立即派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不久的李立三(那时名隆郅)同志去主持。

关于办工人夜校的事，毛泽东同志指示，要取得合法地位，才能顺利进行。因此立三同志到安源时，就用当时已经组织了“湖南平民教育会促进会”的名义，向萍乡县知事去了一个信，说明办平民学校的宗旨……县知事看了，很表赞成。立三同志又联络了一些醴陵等地的绅士，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他们也表示赞助。平民学校于是成立了。

平民学校的学生都是工人的子弟。立三同志作教员。按照一般小学的惯例，学校经常邀请学生的家长来开“恳亲会”，这样就和工人们渐渐接近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平民学校附设的工人补习夜校也成

立了，立三同志等自己教课，对工人作宣传鼓动的工作，并逐渐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原是非常惨的：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几重压迫。工钱很少，工作时间有的达十四、五小时。工人住的、吃的、穿的，真是恶劣到了极点。特别坏的是矿井设备不好，常有死工人的事。在夜校里工人们受了阶级的教育，慢慢觉悟起来了，懂得要自己组织起来才能改善生活的道理。经过两三个月后就开始筹备工人俱乐部（即工会）。“五一”节那一天，正是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日子，“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了。当时会员只三百人左右。

五月里，毛泽东同志从长沙又陆续派来了一批重要的干部到安源来工作，内中有刘少奇同志、蒋先云同志、毛泽民同志等。安源路矿工人中也出现了朱少连同志等积极分子。

这一年湖南以及全国发生了很多的罢工斗争。特别是这年的七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安源来了，因为是同属一个企业，这消息对安源的工人有异常大的影响。九月里粤汉铁路武长段又罢工，在岳州发生军队打死打伤罢工工人几十人的事件……安源的工人听了很是激动。

引起安源工人起来斗争的直接原因，是安源的路矿当局害怕工人组织的力量，和萍乡县政权勾结，要解散工人俱乐部这个所谓“乱党”的组织。工人们听了，非常的愤慨。再则，路局和矿局拖欠工人的工钱几个月不发，工人的生活困难极了。工人们个个都磨拳擦掌，准备斗争。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安源。他研究了当时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和党委的同志们讨论，觉得现在是发动工人斗争的时候了。临别时，他又向同志们作了重要的指示，然后回长

沙；并派了刘少奇等人来到安源，参加罢工斗争的领导。

为了对付资本家的压迫，这时已有一万多个会员的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用强硬的办法作斗争，并提出三项要求，限两天答复。那三项是：

- 一、路矿两局呈请官方出告示保护工人俱乐部；
- 二、两局每月各津助俱乐部费用一百元，共二百元；
- 三、积欠工人的工钱在一星期内全部发还。

九月十二日的晚上，成千的工人正在露天坪里集会，一面等待资本家的答复。路矿两局看见工人组织强，态度硬，形势不妙，只得承认第一第二两项；但对第三项，说是财政困难，无法做到。这种答复在大会上宣布之后，工人不满意。特别是工资问题——不仅要发还几个月的积欠，而且坚决要求增加工资。

一切条件是成熟了。工人们的斗争心是很坚决的。工人俱乐部于是决定宣布罢工，并向路矿两局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条件，最主要的有：承认工人俱乐部（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不许殴打工人；普遍分别增加工资，并改用银元；矿工实行分账制，“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中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这就是说，要废除那剥削工人非常厉害的封建把头制度。

十三日的夜里，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第二天早上，矿工路工共一万七千人一齐罢工。信号是：路工放汽筒，矿工切电线。

毛泽东同志曾来信指示说，这是安源工人第一次罢工，我们事先必须周密地研究形势，估计各方面的条件。没有把握，就不发动；但一发动，就务必达到胜利的目的。他又指示：工人阶级向资本家斗争，发出的口号，务必要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才能取

得工人阶级自己的胜利。——我们说，这是泽东同志作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萌芽。在领导泥木工人罢工及其他工人斗争时，他都英明地运用了策略。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安源路矿全体工人的罢工宣言所以写得很简短，很恳切动人：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

此外，在安源各处的墙壁上贴了许多标语，内中“我们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条，成为了当时人人个个的口号，极得社会各界的同情。

工人俱乐部宣布了罢工纪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在罢工的日子里，工人没有赌博的，没有进鸦片烟馆的，没有打架的——过去在此地几乎每天都打死人，流氓横行霸道，现在秩序却特别的好。因此社会上一般人都很称赞，对工人都另眼相看了。

工人们团结一致，阵容坚强，声势浩大。路矿两局先请驻在萍乡的赣西镇守使派大兵来镇压，没有效果。后来阴谋陷害李立三和刘少奇同志，由于工人们多方的保护，也没有作到。罢工坚持了五天之后，两局只得全部承认工人的十三条要求。

罢工完全胜利了。工人俱乐部门前广场里的庆祝大会上，真是欢声震动了天地。将近两万工人大喊“工人万岁！”“工人俱

乐部万岁！”等口号。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再事整顿自己的组织。公举李立三同志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同志为特派员。工会本身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将全体工人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下。俱乐部成为了全体工人的最高权威机关。除制定了工人自治法规外，并设有裁判委员会，由刘少奇同志兼作主任，解决工人的内部纠纷。这样，矿局原设的司法科就没有人去了。工人纠察队扩大和加强了之后，原来地方上的警察也没有什么用了。工人阶级而且帮助了矿警达到了增加薪金的目的，因为当警察的也是一些农民或工人出身的人，都是在家没法子生活才出门来找事糊口的。

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之后，首先兴办的事业，是工人消费合作社。这是工会为工人谋福利的起了很大作用的一项事业。毛泽民同志^①任合作社的经理。

原来安源的工人们，除资方压迫外，还受把头 and 商人的剥削很厉害。他们开设粮食店赚工人们的钱。他们开设钱摊子为工人们换钱。如工人有银元要换成铜板，这些商人就在发工钱的时候，规定每元换的铜币特别少。其它的日用品也卖得很贵。但自从工人每人出一天的工钱作资本，开办了自己的消费合作

① 毛泽民同志，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同志的亲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一九二四年在安源煤矿担任矿工合作社主任后，一九二五年调上海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亲自在武汉、长沙、上海等地建立了党宣传刊物的发行网——长江书店。一九三一年七月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担任军区经理部（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部长。一九三二年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家银行行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担任国民经济部长。一九三八年转到新疆工作。一九四二年在新疆任财政厅厅长时，因反革命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反苏反共，毛泽民同志被捕入狱，翌年九月不久即被敌人用毒酒毒死。

社以后，工人们买米或面就便宜多了，换银元、铜元也不受骗了。因此不久以后，所有投机谋利的米店、钱摊，都关门离开安源了。

罢工胜利了，封建把头取消了，改为分账制，工人所得增加了一倍。

不久以后，修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房子。这在时间上及规模上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第一个建筑。会场很大，能容千多人。三层楼，圆形，台在中间。红漆、绿漆、黄漆，很是鲜艳。几千个工人参加了修建工作。所有费用，除路局矿局津贴了一部分之外，都是工人自己集资的。

这俱乐部事实上是安源路矿工人总工会的会址，成了工人集会、教育、文化娱乐及一切活动的机关。后来在这里每星期要演三四次新戏，各厂工人轮流来看。

此外，成立了工人音乐队，每厂一队。

成立了工余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共达七校，日班和夜班上课的共计约二千人。

成立了读书处十二处，成立了讲演股、游戏股……

这些都是安源全盛时代的现象。当时某些工运干部、工人学校的教员都取革命的节日作自己的名字，如“黄五一”、“向五九”……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又来到安源巡视工作，指示同志们在矿工路工中发展了党员、团员。一九二三年安源已有十三个党的支部，成立了党和团的地方委员会。

工人运动由安源发展到“汉冶萍总工会”。

由安源派了干部到水口山等处发展工人运动，成立工会。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会都被封闭了，但广东、湖南两省及安源除外。广东是革命政府所在地。湖南及安源工运之所以没有受到挫折，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领导和灵活的策略的缘故。

毛泽东同志看见“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工运都遭受了打击，就作出保全安源一块地区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他后来的革命根据地思想的开始吧。

“二七”时候，各地都有罢工斗争。安源工人也准备了一切，但不立即行动，只作“弯弓待发”的姿态。工人俱乐部方面自己去找矿局，对他声明，只要局方保证本地工运不受压迫，工人就尽可能不罢工。

局方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组织性和战斗力都很强大；这个产业又极重要，罢工则损失很大，所以路矿两局都不敢干涉工人的活动，工会也就得以仍然坚持下去。

因此当时一般的说法是：“安源是小莫斯科”。的确，安源的天空，每天都飘着镰刀铁锤的红旗，总分工会的旗帜也都是红的。

“二七”事变后李立三同志被调去汉口工作。刘少奇同志作工人俱乐部主任——从一九二三年秋到一九二五年春，党又由武汉派来了一批重要干部，到了安源，内中有林育南^①、陈潭秋、黄静源诸同志。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间，安源工运受了挫折。汉冶萍公司不发工资。矿工包围矿主。中国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儿子来

^① 林育南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蒋匪逮捕，牺牲于龙华。

到安源，赵恒惕派手枪队一营人保护他。他一面对工人代表敷衍，一面暗地由萍乡调兵来弹压。赣西镇守使李鸿程（驻扎在离安源十五里的萍乡县）率一团人，武装解散工人俱乐部，打死打伤工人十多人，开除工人五千多，最后并将煤矿停工。安源一时白色恐怖非常猖狂，捕去工人及工运干部与党、团工作人员共十五人，监禁在萍乡县城。十月间工会窿外主任黄静源同志被杀害。他牺牲后，安源工人们背出他的尸身，一夜跑九十里到醴陵，然后运去长沙，在湖南教育会坪举行了追悼大会。

- 安源的许多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广东去了——入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有三十多人，也有参加黄埔军校和政治讲习班的。

北伐军起，安源的工人运动才又活跃起来。工人们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输送队，帮助北伐军。同时有大批工人参加了北伐军，进叶挺同志^①率领的独立团的很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安源的工运自然受到影响而转入完全的秘密状态，但地下活动并没有停止。

许克祥在安源、萍乡制造“六五事变”，杀共产党员、工人、农民一千多人。安源工人和反动派直接武装作战，领导者为朱少连同志等。

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时，安源的工人又有不少加入了

① 叶挺同志，广东惠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四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和军事学校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国共合作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他所领导的团号称“铁军”，战功卓著。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十二月又参加广州起义，担任总指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叶挺同志被俘，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始被释放。出狱后第一天，即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于三月七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四月八日，在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工农义勇军——工农革命军，一同上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的骨干就是安源的工人。

一九二八年时安源煤矿陷于停顿状态，但工人中还保存有强大的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因此秘密的湖南省委会曾经一度设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后的对外联络，和党中央、省委的干部来往，文件传递，都经过安源党的组织。

一九二九年初国民党派重兵到安源来作残酷的镇压，朱少连等大批同志在这次牺牲了。

一九三〇年中国工农红军攻打长沙时，安源工人参加了红军，曾成立了“工兵营”。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曾一度攻入安源，毛泽东同志特来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工人们讲话。那次有一千多工人参加了红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中央苏区及其它苏区有过不少的安源工人出身的干部。

今天在全国各行政区及人民解放军中，仍有一些重要工作干部，过去是安源工人。

四一 湖南工人运动的扩大和深入

毛泽东同志和他所领导的湖南共产党用全力作工人运动的结果，湖南的工运现在已经不仅限于长沙城内和安源矿山那一个大企业，而是逐渐发展、深入到全省各地各个重要产业里面去了。

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导之下，有力地开展起来了。

中国的铁路工人是产业工人中组织最好、斗争性最强的队

伍之一。粤汉铁路的罢工又是全国铁路工人罢工最早发生的——一九二〇年底、一九二一年春和一九二一年冬，各段工人就都曾为了索欠薪、反抗军队打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罢过工。

毛泽东同志很注意铁路工人的工作。如上所述，他曾亲自到铁路工人中间去，和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现在他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一九二二年初新河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八月，毛泽东同志派郭亮同志担负粤汉路工人运动的总责，来到岳州。八月十五日成立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

为了反对监工的虐待工人和克扣工钱，粤汉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包括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等处工人俱乐部)宣布罢工。毛泽东同志和郭亮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制定罢工的策略，在工人群众中和社会各界作广泛的动员，取得他们对罢工的援助和支持。

郭亮同志曾英勇地率领罢工工人横卧铁轨上，阻止少数落后的工人开车。军阀派兵来镇压，打死工人六人，打伤七十多人，逮捕了郭亮和三十多个工人积极分子，押入陆军监狱。

这更引起工人阶级的愤怒。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发动各工会组织，联合各公法团体及各界代表开紧急会议，援助粤汉路罢工工人。武汉全体工人，在武汉工团联合会领导之下，决定用实际行动援助。京汉路、粤汉路全体工人准备同盟罢工。工人阶级如此团结一致，声势浩大，军阀们只得屈服，完全答应工人们的要求，释放郭亮同志和其他被捕的工人。罢工得到了完全的胜利。

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成立粤汉

铁路总工会。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主持成立大会。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最早成立的一个组织。

* * *

水口山三千多个矿工起来斗争了。

水口山（属湖南常宁县）铅锌矿工人的生活素来是很悲惨的。安源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来，这里的矿工们听了都很兴奋。他们于是派代表到安源去接头，请安源工人俱乐部派人来帮助他们。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党派蒋先云同志等去水口山。五天以后，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就正式成立了。

十二月，斗争爆发了。工人俱乐部向矿务局控诉官僚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并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证组织工会的权利。矿局不理，工人俱乐部立即宣布罢工。

局方勾结军队，企图阴谋杀害蒋先云、刘东轩（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副主任），要他们去局里“谈判”，工人群众把矿务局团团围住，高呼口号。这样，资本家、军阀等终于不敢对蒋、刘动手。

长沙、安源、唐山、上海、汉冶萍的工人，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纷纷来电来信，声援水口山工人的罢工。

坚持了半个月的斗争，工人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工人们开庆祝大会，水口山附近的农民都来参加，共有一万多人。会后游行示威，高呼“工人农民万岁！”等口号。

罢工胜利后，刘东轩等几个最优秀的工人领袖加入了共产党。

和安源一样，这里的工人要矿局出钱建房屋，每月给津贴。

工人俱乐部创办了学校。毛泽东同志从长沙派干部来作校长、教员，内有毛泽覃同志^①。

水口山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工人发动、领导农民起来斗争，这里有过光辉的例子。

一九二三年初，党派刘东轩、谢怀德两同志去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这里也是赵恒惕的老家）开辟农民工作。九月中“岳北农工会”（加上工字，表示水口山工人相联之意）开成立大会，到附近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农会。不久加入农会的有十万人以上。他们开展了平粜及阻禁地主运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们，贿买衡山县署，派兵包围农会，捕人、劫物。第二天早上数万农民集合，打算抢出被捕的人，军队开枪，死一人，伤很多人。

这时谭延闿和赵恒惕打仗，谭占衡山，农会领袖们得以释放，沿途八十里，农民放爆竹欢迎他们。谭军败走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赵恒惕派一营兵来，烧农工会会址和谢怀德^②及其他农民的家屋，杀、伤积极分子多人，捕七十多人。刘、谢等及许多农民干部只得逃到江西去。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赵恒惕又派兵来水口山镇压工人运动，封闭了工人俱乐部，一千多工人被解雇而失业，党的工作转入地下状态，蒋先云同志被迫离开了水口山。

一九二四年水口山工人曾经发动过斗争，但无结果。到一

① 毛泽覃同志，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同志的幼弟。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三年在水口山任工人俱乐部教育部委员。后曾任闽西十二军军区秘书长，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五年四月在福建长汀阵亡。

② 谢怀德同志，湖南衡山白果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领导衡山农民协会工作后，一九二七年领导安源工农革命军进攻浏阳，任指挥。工农革命军失败后，被反动的地主武装包围，英勇牺牲了。

九二六年党派陈昌同志秘密来水口山恢复工作。北伐军进到了湖南时,蒋先云^①、刘东轩^②等同志曾回水口山一次,工人俱乐部重新组织起来了。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水口山的工人和附近的农民一万多人,缴了矿警的枪,武装了自己,有三千多工农曾下山攻打常宁县城。一九二八年初又有几百个水口山的工人在山下开展了游击战争,参加了湘南起义,成为红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基础。

此外,新化锡矿山的工人、湘潭锰矿的工人、铜官(离长沙六十里)的陶业工人……也都先后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发动了斗争。其中陶业工人抗议增税的呈文,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写的理由十分充足,对方只有屈服,工人得到胜利。

* * *

长沙城里的工人运动,也一天都不松懈地在继续发展着。在这个产业工人不算很多的城市里,各行各业手工业工人却不少。这项工人,除码头工人外,泥木工人、人力车夫和织造工人是数量最多的。其余各个行业的工人为数虽不多,但也都先后成立了组织,发动了斗争。

这些工人的罢工斗争,由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党委领导而获得胜利的,有三百多个铅印工人坚持一十七天的罢工;有五百多

① 蒋先云同志原是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是学生领袖。一九二二年毛泽东同志到衡阳建党时,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安源、水口山工作之后,去广州入黄埔军校。东江作战时显露其文武全才。北伐战争时作第四军的团长,以英勇善战著名。一九二七年在河南作战时牺牲。

② 刘东轩同志,湖南衡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水口山、岳北工作后,一九二七年被党派至衡阳车江任特委书记。“四一二”事变后,被捕,在车江农民群众的威力下,终于脱险。一九二八年六月,由于叛徒破坏,惨遭杀害。

个理发工人坚持二十多天的罢工；有六百五十个缝纫工人坚持五天的罢工；有一千五百多个织造业工人坚持十三天的罢工；有坚持四十天的笔业工人的罢工。

毛泽东同志曾亲自给劳动条件最苦、生活最坏而又最难组织的人力车夫工人夜校上课。他派罗学瓚同志专门作人力车夫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十月八日长沙人力车工会终于正式成立了。后来长沙城里几千个人力车夫举行罢工、请愿，要求减少车租和反抗军队拉差的斗争，车夫的老婆、孩子……都去了。

泽东同志曾亲自兼任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工人要求加工钱、减工时没有得到结果而罢工之前，毛泽东同志领导他们作好充分的准备，解决工人的吃和住的问题。罢工期间，官方拿武力和拿报纸到湘潭去印刷使工人失业来威胁，泽东同志指示工人：坚持就是胜利。如果此次中途妥协，以后永远再莫想得到胜利了……同时他分析情况（去湘潭印报不可能，那边的工人也不会印的），稳定并加强工人的斗争情绪。

铅印工人是承印长沙的报纸的，和报馆的关系密切。报纸是各界人们都要看的。印刷工人罢工，长沙人曾半个月看不见本城的报纸，自然是很苦恼的事。工会起初向各报写信，请舆论主持公道，赞助工人的合理要求。后来，由于工人的坚持，也由于社会上的不安，报馆的催促，资方和官方不得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工人得到完全的胜利——工作时间由十一、二小时减为八小时；工钱由每月最高八元和最低四元改为正式排字工人每月十二元，其余各种工人和包件另定合理的工资标准。

四二 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

铅印工人罢工胜利之后，平日号称比较进步的《大公报》上，登出了一篇《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的“时评”，作者署名为“盾”。他“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的学问……为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他批评工人的弱点是：“欠缺常识”，“不守秩序”和“不知卫生真谛”，因此他劝印刷工人作体操（！）……他说：“忠告你们工人……每日无论如何，须抽出一二时去授课和运动。”他“更进而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不要“……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祇宜注意提倡工人教育，免除以上所举弱点”。

毛泽东同志觉得，这是那时一般口称同情劳动界的知识分子、中间阶级，看见革命的工人阶级真正起来行动时，就害怕和甚至敌视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决不能放松这个重要的关键，非予以揭露、驳斥，和这种人、这种事作严肃的斗争不可。

因此，就在第二天（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一篇《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在该报上登出来了。信中首先讽刺那个穿着长衣告诫工人的“盾”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来“教训”工人；接着说，工人农民并非不愿受别人的教训，但是……

“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再不要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忠告你们工人’……应当要说：‘我们大家……’才好啊！先生，你真个能诚恳地帮助我们、忠告我们吗？那

么，我们很愿和你握手；请你赶快拿出你的手来，切莫再‘你们、我们’，恍惚象‘我们’是‘官’，你们是‘小的该死’一样。

“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你之所谓‘不再受人驱策，不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先生果何所见而云然？果有何种证据而云然？……我们更愿新闻记者说话要翔实些才好呵……”

“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的朋友……先生，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吗？请快快脱去长衣！”

关于工人读书和运动的问题，信中说：“我们且问你，工人们进补习学校读书的时间在那里？难道他们有分身术吗？并且，长沙城里有几个补习学校？长沙城里有多少工人？请你仔细调查调查，再说话吧。我们现在承认，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我们要减少（工作）时间，雇主不理；我们要团结，人家破坏；故我们不得不有运动。我们要拥护我们读书的利益，而人家说我们不该；我们要聘请指导者，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先生，而人家又说是‘受人驱策’，‘为人牺牲’，并且说他们是‘试验主义’。好好，我们就请那说话的人罢，而他又要穿他的长衣，不能来。先生，请你再给我们想一个更妙的能求得知识的方法吧！免使我们长久受人教训呵！”

“至于说夜里作工，照卫生原理上，你承认全无妨碍。不错呵，编报的人是夜里作工；做官的、当政客的、当议员的，也都是夜里作工。他们为什么肥肥胖胖呢？我们不但夜里作工，日里

也作工,我们不能睡到下午才起床,我们更没有肉吃。劳动者因营养不足,或工作过劳,往往碍其卫生;补救之法,在穷人方面,只有睡眠休息一途,你知道吗?你要我们体力劳动者,在劳力疲倦之后,还要做一二三四的体操、运动,你真是不得我们死吗?……我们也劝劝你,你真是太读多了书呵!我们要请你来试一试,和我们一同工作的滋味了。”

这个书信不仅是和一个报纸一个记者的激烈的辩论,这不是平常的“笔墨官司”,而是尖锐的思想斗争。这是一篇尖锐地驳斥、讨伐和讽刺,同时也是严厉和恳切教育一般“大知识分子”的“檄文”。这篇文章打击了那些高高在上、板起面孔来“教训”工人、事实上是替统治阶级和压迫者说话的人们的气焰;同时是义愤填膺、理直气壮,而又入情入理,提高了工人阶级应有的社会地位,替工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这是对共产党人、一般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工作干部一种严肃的思想教育,——坚持工人阶级思想,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我们的同志“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为大多数工人谋利益”,教育他们,不自命为工人阶级的师长,而“下得身段……挺身而出,做工人的真实朋友”。

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教育同志们都作这样的人。

四三 组织全省工人的总司令部, 向统治阶级作大无畏的正面斗争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十月间,湖南全省(包括安源)已经成立了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工会会员约五

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参加过罢工的斗争，经受过考验。从工人群众中出现了积极分子，培养了干部。发展了党员、团员。其他各行业的工人也都在酝酿罢工，进行组织。现在，成立一个工人的统一的组织这个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同志着手组织湖南全省工人统一的团体。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初，“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同志被选为正总干事，郭亮同志为副总干事。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是湖南各产业工人及手工业工人的总工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的中心组织和指挥机关。它在工人中间的威信，非常之高。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团联合会成为了不仅是湖南工人运动的，而且是整个群众革命运动的总司令部。湖南革命的领导者现在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而是“工团联合会”了。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众、和工人结合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了。

工团联合会虽然已经不只是半公开的组织了，虽然统治阶级不敢公开封闭它和禁止它的活动，但它还是一个“不合法”的机关。所谓“非法的”，就因赵恒惕政府不肯给它立案。

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一天比一天发展，赵恒惕政府更加害怕起来了。统治阶级于是用各种方法来压迫、破坏工人运动。其中的一个法门就是造谣言。他们说，干工人运动的是“过激派”^①，是得了外面的钱。他们又说，工人运动倡无政府主义，就是说，要推翻湖南现在的省政府，那么，政府如何能给他们立案，承认他们的工会呢？相反，省政府要严厉取缔这些不法的团体

^① 当时反动分子恶意地也是无知地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为“过激派”。

和惩办为首的一些过激分子。

此外，警察局、长沙县政府、封建把头等等又制造一些向工人挑衅的事件。

毛泽东同志于是觉得，工团联合会——工人阶级有争取主动，向统治阶级作正面斗争的必要。

他以“全省工团联合会”正总干事的资格，亲自率领“工联”各个工会的代表二十多人，直接去找长沙县长、警察厅长、政务厅长和省长赵恒惕本人，和统治阶级当面说理，进行交涉、谈判。交涉事项，约分十项：一、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二、集会结社自由问题。三、表明工界的态度。四、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五、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其余六、七、八、九、十各项，为当时各业工人的一些具体纠纷问题。

毛泽东同志作这种合法斗争的武器不是别的，恰好就是赵恒惕的所谓“省宪法”。他根据那个“宪法”的条文，理直气壮地力争工人应享的权利。他逼迫统治阶级不得不再一次公开地、明白地表明一下自己对工人的态度，重复一次自己对工人和民众所说的一套冠冕堂皇的“诺言”。他幽默地讽刺统治阶级一向袒护、勾结资本家和店主的丑恶，斥责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侮辱。统治者们这个说：“劳资最好不要互斗，而要互让，免得造成社会上的大损失。”那个说：“目前应以开发实业为主，所以最好是劝工人稍为忍点痛苦”……毛泽东同志反过来说：“……我们认为，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就是政府应该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那么工人就不会和他们发生冲突了。”他严正地责备赵恒惕非法杀死黄、庞。他说，省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了“人民有……自由”，“……不得无故捕人，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应送司法机关审讯、处理”么？他又说：“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被封闭一

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名誉上法律上的损失真不可数计呵……。”一番话说得赵恒惕哑口无言。

据当时参加代表团的工人代表的回忆，当代表团直接去找赵恒惕的时候，赵不得已，和几个幕僚一块出来接见。他说了一番话，大意还是诬蔑工人不要政府啦，共产、公妻啦……

毛泽东同志听了，藐视地说：

“你先生说的话都不对，都没有道理。我们不和你谈了。我们要找省长去说。”

赵恒惕当面受了奚落，脸红了，一时不好作声。他旁边的人指着他说：“这就是省长！”

毛泽东同志故意惊讶了一番，然后对赵恒惕说明，湖南现在的工人运动不是搞无政府主义，而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公妻”等等说法是谣言……

于是毛泽东同志向那位省长阐述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宗旨……他说：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对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的话，这完全不是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对于工人并不利。他又说：工人是有政府主义，就是说，是主张要政府的，但是要为大多数劳苦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毛泽东同志代表被统治和受压迫的阶级向统治阶级和压迫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利用假的宪法的空头条文作合法的根据，说自己的话，作自己的事，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得理由十分充足。赵恒惕听了，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出色的人。呕气的省长便装出爱护青年学生的样子，并且转而

讥诮地对毛泽东同志说：

“很明显的，你不是工人而是学生。为什么你干预他们的事，用工人代表的资格在我面前说话呢？”

毛泽东同志从容地答说：

“省长，请你问一问同来的这些位工人，”他指着站在他旁边的、听了非常出神、心中无量佩服、敬爱他们的总代表的一群工人代表们，“请问一声，我是不是工人的代表。假若他们说不是，我出去就是了。”

赵恒惕再没有什么办法为难他了。

湖南工人阶级——全省工团联合会对反动狡猾的统治者赵恒惕政府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在这胜利的鼓舞之下，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实际教育之下，湖南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更加加强了。他们更加提高了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工人运动最大的收获：明白了，正义与真理是在工人阶级这一方面。

全中国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普遍高涨。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之后，湖南的工人运动也继续发展。许多工会的牌子都挂出来了。从纱厂工会、黑铅炼厂工会、泥木工会、铁路工会、电灯工会、造币厂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石印工会、缝纫工会、织造工会、理发工会……到店员工会、水手工会、划夫工会、码头工人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邮务工会、厨工会、油漆匠工会、靴鞋匠工会、铜匠工会……这些工会的会员数目有的是几百人，有的只几十人，但他们先后都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工会。工会的威信非常的高，以至看卦、算命的也要求成立工会；但“工团联合会”认为，这些人借迷信骗人，不是正

当的劳动，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各工会组织十人团，即工会小组，和党的街道支部联系。

工会内大多建立了党的小组。

五月一日劳动节，湖南全省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现在，湖南的——中国的工人运动已经达到了空前壮大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为成立全路总工会，受吴佩孚、萧耀南的残酷镇压，演成“二七惨案”。形势紧张，波及湖南。但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共产党的组织还是利用军阀作为掩护割据自封的所谓“省宪自治”，发动舆论，责骂吴佩孚，“稳住了”赵恒惕。赵也因自从杀黄、庞后，人民反抗激烈，才不得不暂时减轻压迫。因此“二七”失败后，各地（广东除外）工会都被封禁了，但湖南的工运一时还没有受到挫折。

但是尖锐的斗争仍然继续发展着。赵恒惕一面收买行会中的封建把头，和新工会对立，想尽各种方法来破坏行会工人新工会，压迫产业工人的工会；一面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泽东同志从容不迫地把湖南的工会工作、民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新的运动和共产党在湖南全省的整个工作，都周密地布置了一番，在通缉令发下了半个月之后，离开了湖南，到那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去。他出席了一九二三年六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后毛泽东同志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对于由自己一手所建立的湖南的党和工会的工作，对湖南人民反赵恒惕的斗争，仍然非常关怀，经常来信指示。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共产党和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策。毛泽东

同志在大会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反对了陈独秀^①的向资产阶级、国民党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以张国焘^②为代表的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左”倾关门主义。

一九二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改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回上海，在这里用大力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准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二五年泽东同志曾回湖南故乡韶山，着手组织农民，短期间成立了许多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赵恒惕派兵来捕，泽东同志脱险去广州。在那里，泽东同志实际领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同时主办有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个和黄埔军校同样重要的，培养民众革命运动干部的学校，任该所所长，并亲自教课。湖南的和各省的许多工农积极分子和干部，都来到了讲习所受训练。一九二六年秋，泽东同志到上海，作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

① 陈独秀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当时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放弃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驱逐出党。陈独秀死于一九四二年。

② 张国焘，中国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机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错误极多，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反对红军北上，主张红军向四川西藏间少数民族区域退却的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并且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自立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使红军第四方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红军第四方面军及其广大干部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耐心教育，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但张国焘本人则终于不可救药，于一九三八年春季，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并投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

沙考察农民运动，写成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怀着满腔热情，歌颂农村革命与革命先锋。这是一部光辉的马列主义珍贵的文献。一九二七年春泽东同志到武汉，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武汉国民政府继南京蒋介石的叛变，使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了。泽东同志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奉党命到湖南、江西领导湘鄂赣三省秋收起义，组织工农革命武装，许多湖南、安源的工人农民参加进来了。在大革命低潮时期，泽东同志作有计划的退却，并以退为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此后十年的土地革命。——这些虽是后话，但在这里简单提及，可见毛泽东同志所手创的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基础是颇为雄厚的。

四四 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的进步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和青年学生的很大部分都已觉醒和站起来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巨人的姿态，大踏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富有革命传统的湖南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都先后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特别强大。他们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便是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便是湖南人民、工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湖南的——中国的人民、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产生（培养、锻炼、考验、选拔）了自己的领袖。反回过来，这个领袖又英明智慧地率领、推动湖南人民、工人前进，成为全国人民全国工人阶级一支特别坚强特别结实和雄厚的队伍。正如许多老的同

志所回忆的，那时候工会和党的作风，在全中国以湖南（包括安源）为最好。很明显，这是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

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同志学习的是：他从开始他的初期革命活动时起，就凭自己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心，并秉着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工作，全心全意地作人民的勤务员、长工。在这时期，他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信心，体会了人民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智慧。于是他恭谨勤劳地继续向人民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并更加紧密地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和人民打成一片。

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谦虚的，谨慎的。他不骄傲自满，也不急躁。他总是有原则的，不苟且迁就。他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真如古人说的：“有过则改”，“从善如流”。这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

在这时期毛泽东同志丰富了自己的社会知识，获得了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他学习了将群众的意见、思想、经验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应用的领导方法。同时，他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紧紧地团结最优秀的同志，逐渐形成集体领导的骨干。

从这时期起，毛泽东同志奠定了自己在革命理论的建设上的一块稳固的基石，这就是他后来胜利地领导整个中国的伟大革命所作的对于人类思想的伟大的贡献——他英明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和人民民主新中国建设的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组织家，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真正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的作风，谦虚、谨慎，欢迎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作风)，到后来形成为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它对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绝大的珍贵的影响，起着积极的决定的作用。

这种作风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工作者都应该向毛泽东同志好好地学习的。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八十年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经不断地、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各种各式的斗争，以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官僚买办的压迫剥削。这些斗争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和坚强的领导而屡次失败。中国这个国家和社会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里面。人民的痛苦一天天加重。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无产阶级成了民族和人民中间最革命最坚强的阶级。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产生了政治觉悟最高、组织性最强、团结最坚固、理论最进步最科学、政策最正确最灵活、领导最英明最坚定的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有了这样的党，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就有了确定不移的胜利的保证。不管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如何残暴阴险，不管他们在中国的各色走狗如何卑鄙野蛮，他们的统治是要被打倒的；人民是要胜利的——这有此后二十多年来几次伟大革命斗争的高涨为证。这有人民革命的胜利为证。中国共产党所以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建设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所以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列宁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体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

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①这就是“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②

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就是这样的领袖和集体。

列宁又说过：“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③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的中国人民群众革命的领导和灯塔。

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都由毛泽东同志集中体现了出来。

走着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开创的这条道路，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一个崭新的、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球上出现了，数千年极少数剥削者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历史宣告结束，百余年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宣告结束。广大劳动人民从被压迫者变成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从此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为世界政治、世界革命的发展增加了新的重要动力，展示了新的光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文集》第四卷，第一九七至一九八页。

② 同上书，第一九五页。

③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载《列宁文选》第一卷，第六〇一至六〇二页。

明前景！

末了，让我引用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学习毛泽东》^①里的一大段话，希望热爱周恩来同志的青年同志们好好体会学习。“学习毛泽东，必须是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的直接奋斗，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中国四个革命阶段（按：指第一次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正确的。”但毛主席不是“天生的圣人”，“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也曾经信迷信过，他也曾经读过古书，他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注重一方面，对另一方面没有注重。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周恩来同志又说：“他（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

让我重复周恩来同志的话：“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一九七九年九月

^① 见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中国青年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

作者 = 萧三

页数 = 1 4 9

S S 号 = 1 0 2 5 8 2 6 2

出版日期 = 1 9 8 0 年 0 7 月 第 1 版

出版社 =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录

- 第一章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少年
 - 一、农民的儿子
 - 二、六岁就开始参加劳动
 - 三、一个诚实的孩子
 - 四、从小就好学
 - 五、但他是倔强的
 - 六、被压迫人们的少年同情者
 - 七、年十五六而志于救国
- 第二章 卷入辛亥革命运动的漩涡
 - 八、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
 - 九、干革命——当兵去！
 - 一、注意时事和社会问题
- 第三章 他是怎样认真学习和刻苦锻炼的
 - 一一、要求学还是靠自修
 - 一二、博与专的学习
 - 一三、学问，学问，好学还要好问
 - 一四、读书的“四多”方法
 - 一五“特别”学生
 - 一六、锻炼身体，锻炼意志
 - 一七、“游学”——开始作社会调查
 - 一八、政治的头脑，科学的头脑
- 第四章 “组织起来”的第一页（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
 - 一九、组织家的天才
 - 二、学生自治团体——学友会组织起来了
 - 二一、和城市工人最初的接触
 - 二二、最初的反军阀斗争和第一次受军事洗礼
 - 二三、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
- 第五章 站在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哨
 - 二四、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 二五、接触马克思主义
 - 二六、开展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 二七、革命的新闻、政论工作——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
 - 二八、领导“驱张运动”
- 第六章 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
 - 二九、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为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三、宣传！组织！斗争！
 - 三一、他同时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
 - 三二、找到了更好和工人接近的语言
 - 三三、“作始也简”（成立中国共产党）
 - 三四、可纪念的“三十节”
 - 三五、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 三六、创办最初的“党校”
- 第七章 大规模地努力作工人运动
 - 三七、斗争是不简单、不容易的

- 三八、工人阶级抬起头来了
- 三九、“我就是工人代表”
- 四、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支雄厚力量——安源工人俱乐部
- 四一、湖南工人运动的扩大和深入
- 四二、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
- 四三、组织全省工人的总司令部，向统治阶级作大无畏的正面斗争
- 四四、向毛泽东同志学习！